

征稿启事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是中共合肥市委主管，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合肥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理论刊物。本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关注改革发展前沿问题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紧密围绕省情、市情选稿组稿，大力开展政策研究、市情研究、咨政研究和理论宣传，形成了具有浓厚时代特征、地域特点、党校特色的理论宣传平台。

本刊于2003年入编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并进入CNKI中心网站。现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入库期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为进一步提高本刊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将本刊打造成为“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的学术名片和重要窗口”，现向社会公开征稿，热诚欢迎广大社科工作者惠赐佳作。

投稿须知：

1. 稿件应当主题突出、观点鲜明、论证严密、语言文字合乎规范，有独到见解，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实践借鉴价值。本刊特别欢迎关于“安徽省情、合肥市情”方面的研究报告。

2. 稿件字数以4000—10000字为宜。

3. 将正文以附件形式发过来，并将单位名称、详细地址、邮编、电话、电邮、摘要、关键词（3—5个）、来稿日期、作者简介（出生日期、民族、职称职务、学历学位、研究方向等）放在正文标题下。

4. 参考文献、注释等放在文尾，勿用脚注或夹注。注释是作者对题名、标题或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注释须放在正文后的参考文献之前，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加圆圈标注：①、②、③……。参考文献是作者写论文时所用引文的出处或参阅的各种书刊资料，须集中列在论文的文末，参考文献序号标注：[1]、[2]、[3]……

5. 来稿文责自负，在不改变文章主要观点的前提下本刊编辑部有权对文章作适当修改，若作者不同意修改请在来稿时作特别说明。

6. 本刊已被“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等收录，如作者无特别声明，即视为同意在网站或光盘上同时刊出。

7. 请勿一稿多投。本刊的选稿周期为3个月，3个月内未收到用稿通知的，作者可自行处理。请作者自留底稿，来稿一律不退。

8. 本刊选稿以质量为唯一标准，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来稿一经刊用即付稿酬并寄送2本样刊。

9. 本刊目前并无网上投稿平台，也未委托任何组织或个人代为征稿。一些打着本刊所谓“官网”名义的网上投稿、征稿平台，骗取作者审稿费、发表费的行为，均与本刊无关，均属非法行为。请投稿作者切勿上当受骗。

本刊样刊浏览网址：<http://hfdx.hfzhi.com/>

本刊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明理路《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邮政编码：230031

联系电话：（0551）62206658 62206629

电子信箱：XB1233@126.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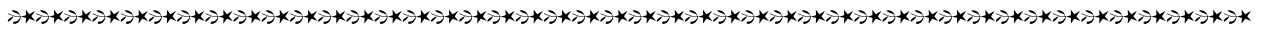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

2024年第6期
(总第110期)
双月刊

主管单位：中共合肥市委
主办单位：中共合肥市委党校
出版单位：《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陈得良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俊 王辉龙 王良仲 王义 王玉 王智源 江飞
江浩 刘玉勉 孙维红 陈得良 何永义 李安福 李敏琪
李宗开 范观兵 金玥 周良金 胡爱敏 胡厚翠 凌德政
陶晓娟 黄传霞 程千宜 瞿晓陆

主编：马俊
编辑：黄宁平
朱少家
徐书琴



理论视野

- 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及其提升进路杨小草 王玉堂(3)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现实梗阻与优化路径.....李博(9)

策论园地

- 长三角一体化下安徽人口流动与高质量发展研究.....周清 王泽强(19)
构建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驱动逻辑、现实梗阻与实践进路.....刘雅静(23)
网络圈层化的技术逻辑与治理路向.....王亮亮 贺美然 高慧(30)

版权声明

本刊已许可本刊合作单位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相关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

发 行:《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通信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明理路
邮政编码:230031
电 话:(0551)62206658;62206629
电子信箱:xb1233@126.com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674-5000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4-1249/Z

学思札记

中央苏区时期革命文化传播载体研究……………隋秀英 魏扬明(35)

无产阶级从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的内在逻辑

——基于马克思“1852-1858 年间英国政论文章”的分析……………白宇乔(43)

信息荟萃

“新质生产力:合肥巧解‘四对关系’”等八则……………(52)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24 年总目录……………(63)

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及其提升进路

杨小草 王玉堂

(东平县委党校,山东 东平 271500)

[摘要]法治是人类走向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人类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就越需要健全、完善的法治。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然是一个唯法而尊、循法而行、依法而治的法治国家。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现代治理的核心要求和必然选择。我们党依法执政、领导人民依法治国,法是最根本的依据,法治是最基本的手段,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最有力的支撑。新时代新征程,改革进一步全面深化,利益关系、利益格局深度调整,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方式、社会心理等不断发生复杂深刻变化,各种矛盾和问题往往不期而至,必须树牢法治意识,锤炼法治思维,不断提高法治思维能力,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解决难题、应对挑战,以高水平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保障和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高法治思维能力,必须坚定法治信仰,提升法治素养,加强实践养成,优化制度供给。

[关键词]全面依法治国 法治思维 法治方式 法治思维能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①“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唐·吴兢:《贞观政要·公平》)人人守法、事事依法自古就是人们的理想追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

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②,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我们党依法执政、领导人民依法治国,法是最根本的依据,法治是最基本的手段,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最有力的支撑。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必须树牢法治意识,锤炼法治思维,不断提高法治思维能力,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

收稿日期:2024-11-18

作者简介:杨小草,中共山东省东平县委党校讲师。王玉堂,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基地特邀研究员。

作、解决难题、应对挑战,以法治化保障和促进现代化,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一、法治、法治思维与法治思维能力

什么是法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法律的准绳去衡量、规范、引导社会生活,这就是法治”^[139]。法治是人类走向文明、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然是一个唯法而尊、循法而行、依法而治的法治国家。人类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就越需要健全、完善的法治;越是走向现代化,就越是需要法治化。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墨子说过:“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墨子·法仪》)东汉时期的王符则直言:“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东汉·王符:《潜夫论·述赦》)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法治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1417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谋划工作要运用法治思维,处理问题要运用法治方式”^[14139],而且“国际国内环境越是复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越是繁重,越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巩固执政地位、改善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142]。法治思维是基于法治的固有特性和对法治的信念来认识事物、判断是非、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法治方式是运用法治思维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5]。法治思维能力,就是增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善于运用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能力^[6246]。法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法治进步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运用法治思维破解难题、促进发展,运用法治方式化解矛盾、促进和谐,运用法律法规维护

社会秩序、促进公平正义,越来越成为提升治理能力和成效的不二选择。

“治国者,必以奉法为重。”^[17477]我们党一贯重视法治建设,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1954年9月,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由此拉开了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幕,其后尽管经历过坎坷和挫折,但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努力一直没有放松。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828]的奋斗目标,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829]。2010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了“法治思维”的概念,要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尊法、守法、用法,……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9]。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10634],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10635]。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党员干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要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高级干部尤其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12]。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11]。党的二十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战略擘画和部署,强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宝贵经验，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遵循的“六个坚持”原则，“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其中之一，强调“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2]，要“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及时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2]。这一系列重大部署、重要论断，相互衔接、一脉相承，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坚持依法执政、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战略自信，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领导干部锤炼法治思维、提高法治思维能力提供了科学指引。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韩非子·心度》）法治是一个不断发展、逐步完善、与时俱进的过程。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创新成果，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进行总结和概括，及时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推动形成更为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以更为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构筑高水平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保障和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二、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现代治理的必然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治理。”^{[4]120-121}“治民无常，唯法为治。”（《韩非子·心度》）现代治理的核心是依法治理，法治化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自然也就成为现代治理的核心要求和必然选择。

（一）党依法执政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依法执政才能执好政。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2]依法执政是现代政党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12]83}，其使命任务和面临的形势、所处的环境都发生了重大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也必须随之转变。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就必须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全面有效实施宪法和法律，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不断“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通过法治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实施”^{[4]2}，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执政难题，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融合为执政优势、转化为执政效能，在不断推进事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长期执政地位。

（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依法治国才能治好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4]全面依法治国之所以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实践证明，“没有全面依法治国，我们就治不好国、理不好政，我们的战略布局就会落空”^{[4]149}，只有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8]28-29}，才能更好地“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4]21}，不断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维护和规范社会秩序，

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筑牢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社会根基。

(三) 实现治理现代化需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支撑。法治是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素，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4]183} 实现治理现代化是治理者不懈追求的目标。治理现代化首先是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的现代化。法治代表着公平和正义、文明和秩序，体现着人们对平等享有权利的追求，既是一种治理理念、治理目标，又是一种治理方式、治理手段。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进程中，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的行为，进而提升治理效能、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其方式和手段多种多样，不同历史时期的治理者有许多创新创造，但毫无疑问的是，法治理念是最先进的理念、法治方式是最科学的方式、法治手段是最有效的手段。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实现治理现代化需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支撑。

美国政治家约翰逊(Lyndon B.Johnson)曾说：“法律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别的发明让人类学会如何驾驭自然，而法律的发明则令人类学会如何驾驭自己。”^[13] 法治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14]206}。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走向现代化，必须重视法治、厉行法治；没有法治化，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只有善于运用法治思维，不断提高法治思维能力，我们才能更好“驾驭自己”，在法治轨道上把中国式现代化推向前进。

三、不断提高法治思维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主要是通过各

级领导干部的具体行动和工作来体现、来实现”^{[4]135}，故此，“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4]15}。“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子·有度》)法治的本质“其实是‘人依法而治’。”^{[15]71}，正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娄上》)。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才有国外学者提出，“离开了执行那些能促使国家现代化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的人本身的现代化，这些制度便会成为有名无实的无灵魂的躯壳，或者被扭曲变形，弊病百出，背离这些制度原所预期达到的目的”^{[16]273-274}。在我国，领导干部就是“执行那些能促使国家现代化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的人”，他们“具体行使党的执政权和国家立法权、行政权、监察权、司法权，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4]231}，必须善于运用法治思维，不断提高法治思维能力。

(一) 坚定法治信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必须被遵守，法治必须被信仰，否则就形同虚设了。”^{[4]131} 信仰是支配人们思维活动的精神力量。人生需要信仰，有了信仰，才能“终其一生，为他的信仰的实现而奋斗到底”^{[17]138}；法治思维需要法治信仰，法治信仰越坚定，法治思维就越深厚。提高法治思维能力，必须坚定法治信仰，把法治理念、法治精神刻在骨子里、融入血液中，仰视而守、俯身而行。宪法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18]113}，共产党人的法治信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法治领域的集中体现。信仰法治就要坚守法治，就要深刻认识到“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法律尊严

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法律实施就是保证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实现”^[41]，以坚定的法治信仰、法治信念筑牢尊崇法治、敬畏法律的思想根基，增强“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414]的法治意识和“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415]的法治自觉，不断提高法治思维能力。

(二) 提升法治素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观念、法治素养是干部德才的重要内容。”^[4142]“为官之义在于明法。”^[1939]法治思维源于领导干部对法治的尊崇、敬畏和法治素养。没有深厚的法治素养，就不可能有成熟、自觉的法治思维。法治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334]。提高法治思维能力，要深入学习宪法、法律，掌握基本法理原则，树牢法治理念；深入学习、深刻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准确把握其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牢牢把握“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4107]的鲜明政治逻辑和根本价值取向，“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414]，不断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思想自觉和行为自觉，努力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三) 加强实践养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出真知，实践长真才。”^[14535]法治思维是一种实践思维，提升法治思维能力是一个实践命题，法治思维和法治思维能力

都需要在依法履职的过程中养成、在依法履职的实践中锤炼、在处理复杂矛盾和问题中强化。要增强法治意识，培养法治自觉，做心中有法、带头守法、善于用法的模范，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415]的思维习惯，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过程中涵养法治思维，在“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实践中锤炼法治思维能力，不断提高依法而治的能力和水平。要坚持以法治思维引领法治实践，“心中高悬法律的明镜，手中紧握法律的戒尺”^[4139]，牢牢把握为官、做事、用权的尺度，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时刻不忘法律依据和法定程序^[20146]，让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谋划推动工作、研究解决问题成为常态，事事坚持有法可依的依法办，无法可依的依据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办。对工作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特别是一些久拖不决的“老大难”问题，更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寻求破解之道，在“经一事、长一智”中提高法治思维能力。

(四) 优化制度供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21185]制度带有强制性、规范性和导向性，健全、完善的制度是领导干部依法履职的重要保证，也是提升包括法治思维能力在内的履职能力的重要支撑。要建立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的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2]，引导干部尊崇法治、依法决策。“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2]，要严格追究相关人员的

法律责任,倒逼干部敬畏法律、依法办事。“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1]。选拔任用干部,要把法治素养和依法履职情况作为一项重要依据,形成“以法论英雄”的鲜明用人导向和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引导激励机制。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1485] 新时代新征程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对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法治能力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明·张居正:《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领导干部拥有了法治思维能力,也就拥有了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习惯与自觉和推动“法之必行”的能力与动力。新时代新征程,改革进一步全面深化,利益关系、利益格局深度调整,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方式、社会心理等不断发生复杂深刻变化,各种矛盾和问题往往不期而至,必须高度重视“发挥法治在排除改革阻力、巩固改革成果中的积极作用”^[122]和“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坚持依法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14292],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谋改革、抓发展、保稳定、促和谐,以强大法治思维能力“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12],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迈出新步伐、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效。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26.

[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N]. 人民日报, 2014-10-29.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4] 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5] 陈希. 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N]. 人民日报, 2014-12-17.

[6]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19.

[7] 罗贯中. 三国演义[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2.

[8] 江泽民文选: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9] 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10-11-09.

[10] 胡锦涛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17-10-28.

[12] 习近平. 论党的自我革命[M].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国方正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13] (转引) 张文显. 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J]. 法学家, 2023(2): 1-15.

(下转第 18 页)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 现实梗阻与优化路径

李博

(桂林理工大学,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正在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能够聚合生产要素,触发农业全链革新;驱动效能释放,激活农村人才势能;畅通传播渠道,赋能文化创新传承;重构发展路径,构建绿色发展格局;再造治理架构,实现基层协同运作。但是也面临产业发展、人才培养、文化建设、生态振兴、数字治理等方面的现实困境,需聚焦兴产业、育人才、传文脉、净生态、强治理五大维度,通过加强产业数字适配、完善数字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特色乡土文化、开创生态建设新局面、优化数字治理机制等进行纾困引导,为乡村全面振兴插上数字之翼。

[关键词]数字技术 乡村振兴 内在机理 优化路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在新时代乡村振兴征程中,数字技术已成为激活农村发展潜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抓手。数字技术的广泛渗透与深度应用,不仅重构了乡村发展的技术基础,更催生了生产组织、治理模式与文化遗产的范式变革。在这场技

术革命与乡土社会的融合进程中,数字赋能已超越工具性替代的初级阶段,演变为触发系统性变革的核心动能。技术逻辑与乡村生态的碰撞既释放出提质增效的革新潜力,也暴露出价值冲突、能力断层与制度摩擦等多维张力。这种复杂性昭示着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本质并非简单的技术移植,而是涉及技术系统、社会结构、制度体系与文化认知的深度调适过程。当前实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嵌入式发展研究”

(立项编号:22CMZ01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新时代民族地

区乡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立项编号:21YJCZH090)。

收稿日期:2024-11-23

作者简介:李博,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践亟须突破“重设施轻生态、重效率轻包容、重应用轻治理”的思维局限,在技术工具理性与乡村发展规律之间建构动态平衡机制,为乡村振兴注入兼具科技动能与人文温度的发展活力。

一、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本质在于通过数据要素的流动性、智能性、系统性重构乡村发展的要素配置、组织形态与价值转化逻辑,形成“技术嵌入-结构变革-动能激活”的链式反应,最终推动乡村从传统封闭系统向现代开放生态的跃迁。这一过程以数据为新型生产资料,以算法为规则重塑工具,以数字平台为连接载体,既作为效率工具推动物质繁荣,又作为文化媒介守护精神家园,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中,推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治理等多维空间深层次变革,实现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

(一)数字技术聚合生产要素,触发农业全链革新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本质在于通过生产要素的数字化重构与产业链的系统性整合,形成具有自组织能力的产业生态系统。这种变革突破了传统农业经济中要素流动的时空限制,构建起以数据为核心驱动力的新型生产函数,推动乡村产业从经验依赖型向智能决策型跃迁,从分散经营向协同创新转型^[1]。在要素整合层面,数字技术通过构建全域感知网络,将土地、劳动力、生产工具等传统要素转化为可量化的数据流。这种数字化重构打破了农业生产要素的物理边界,使闲置资源的可视化识别与精准化配置成为可能。数据要素与传统要素的融合创新,催生出农业社会化服务、定制化生产等新型业态,推动生产要素从低效固化状态转向动态优化配

置。在产业链重构层面,数字技术通过构建全链数据贯通系统,形成覆盖生产端、加工端、流通端与消费端的智能决策网络。生产环节的物联网设备实时采集作物生长数据,与市场需求信息交叉分析后生成种植方案;加工环节的智能控制系统根据原料特性动态调整工艺流程;流通环节的区块链溯源体系实现品质信息透明传递;消费端的大数据分析反向指导品种改良。更深层的变革在于产业生态的重塑。数字平台构建起连接新型经营主体、科研机构、金融机构等多元主体的协作网络,形成知识共享、技术扩散与价值共创的产业创新共同体,打破了传统产业体系的层级结构,建立起多向互动的创新生态系统,使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与制度创新得以在产业实践中深度融合,持续激发乡村产业的内生发展动力^[2]。

(二)数字技术驱动效能释放,激活农村人才势能

数字技术以技术工具重构人力资本增值路径,打破城乡人才要素流动的壁垒,激活乡村内生性发展动能,重塑了人才培育、流通与价值实现的深层逻辑,构建起“数字教育-协同网络-制度创新”的三维赋能体系,推动乡村人才结构从“单向流失”向“动态平衡”转型,形成人力资本与乡村发展需求深度耦合的新型生态。在人力资本培育维度,数字技术以在线教育平台与虚拟现实技术的融合,使优质课程资源突破地理限制。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分析个体学习轨迹与乡村产业需求,动态生成个性化培养方案,推动技能培训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这种技术赋能的培育模式,既弥补了乡村传统教育体系的短板,又通过数据驱动的能力画像,将碎片化知识整合为适配乡村发展需求的知识图谱,消解了乡

村教育资源的时空约束,构建起终身化、普惠化、个性化的学习系统。在人才流通层面,数字技术重构了城乡人才要素的配置机制,通过大数据系统分析乡村产业缺口与人才技能特征,构建供需精准对接的智能桥梁,引导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向乡村柔性流动;借助远程协作工具打破物理空间阻隔,使城市专家通过云端参与乡村项目运营,形成“在地服务”与“离岸赋能”相结合的混合工作模式。在制度创新领域,数字技术推动人才治理体系向精细化、科学化演进,借助数字技术模拟不同政策对人才结构的影响,制定前瞻性引才规划;通过社交媒体舆情分析与人才流动数据建模,实时监测人才生态的健康指数,建立风险预警与动态调适机制,将人才政策从经验判断转向循证决策,提升制度供给的精准度^[9]。

(三)数字技术畅通传播渠道,赋能文化创新传承

数字技术的介入,正在从深层次上重塑乡村文化的传承、传播与创新机制,其本质是通过技术工具与人文价值的深度耦合,推动乡村文化从传统封闭系统向现代开放模式转型。其一,数字技术赋能文化突破边界,摆脱传统时空边界制约。传统乡村文化受限于地理空间与线性时间,其传播范围局限于物理场域,传承模式依赖代际延续。数字技术能够将文化符号转化为可存储、可传输、可复制的数据形态,消解了时空壁垒。这种时空维度的突破,使乡村文化从“地方性知识”升级为“全球性文化资源”,在虚拟空间中形成动态延续的文化生命体。其二,数字技术赋能文化权力再分配,构建多元参与的治理体系。数字技术改变了乡村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权力结构,打破了传统由文化精英主导的“中心化”模式。以新社交媒体平台赋予普通村民文化表达

权,形成“去中心化”的内容生产网络,激发了乡村文化内生动力,使村民既是文化传承者,也是创新参与者,构建了“政府引导-村民主体-社会协同”的新型文化传承体系。其三,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价值再生产,激活要素融合的创新范式。数字技术通过“文化要素数字化-数字资源产品化-文化产品资本化”的转化链条,重构了乡村文化的价值实现路径。一方面,文化资源经数字化编码后,脱离物质载体束缚,通过虚拟展览、数字版权交易等形态创造新型文化消费场景。另一方面,数字平台整合文化、技术、资本等要素,催生“文化+电商”“文化+旅游”等融合业态,形成文化价值转化的乘数效应,推动乡村文化从“输血式保护”转向“造血式发展”^[4]。

(四)数字技术重构发展路径,形成绿色发展格局

数字技术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驱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能够通过重构资源利用逻辑、重塑生产组织形态与创新生态价值转化机制,为乡村破解传统发展模式中的生态约束与效率瓶颈提供了新路径。其本质在于以数据要素的流动性、共享性与智能性激活乡村生态系统的内生动力,通过技术嵌入实现自然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协同增值,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范式。在资源维度,数字技术通过精准感知与智能分析,将土地、水源、生物多样性等生态要素转化为可量化、可追溯的数据流,突破传统资源管理中信息不对称与决策滞后性,形成“监测-评估-调控”的动态闭环,使生态承载力的刚性约束转化为弹性调控空间。在资源利用层面,数字技术通过物联网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推动农业生产从经验依赖转向数据驱动,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减少资源冗

余消耗,实现“投入减量-产出增效-污染可控”的绿色生产^[5]。同时,数字平台能够打破时空界限,将分散的生态资源整合为可交易、可定价的数字资产,借助区块链确权与智能合约执行,构建起森林碳汇、水土涵养等生态产品的市场化交易机制,破解“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价值梗阻,形成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的可持续激励循环。在治理层面,数字技术通过构建环境数据共享网络与多元主体协同平台,推动乡村生态治理从单向管控转向共治共享,政府、企业与村民依托实时监测数据与算法模型,共同参与生态风险评估、污染溯源与生态修复决策,在提升治理透明度的同时强化主体责任意识^[6]。

(五)数字技术再造治理架构,实现基层协同运作

数字技术通过数据要素的流动、算法模型的嵌入与数字平台的联结,推动治理模式从“经验主导、层级管控”向“数据驱动、多元共治”转型。其本质是以技术为中介重塑治理主体关系、优化权力运行机制、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构建更具适应性、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乡村治理新生态。数字技术赋能的治理现代化并非简单的工具升级,而是通过数字化消解传统治理的时空边界与组织壁垒,在“数据-制度-社会-个体”的互动中实现治理能力的系统性跃升。传统乡村治理受制于信息不对称与科层制惯性,常面临决策滞后、参与不足、服务粗放等困境。数字技术通过技术工具与治理流程的深度融合,构建全域感知网络与数据共享平台,将分散的人口、土地、环境等治理要素转化为可量化、可追溯、可分析的数据流,构建起覆盖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的治理系统,推动治理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预防,从碎片化管理转向系统性调控,使治理

主体能够突破经验局限,从模糊感知转向精准认知,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数字技术同时重构了治理主体的互动关系,催生“政府-市场-社会-村民”协同共治的新格局,使治理权力从垂直控制转向水平分布,构建起“技术赋权、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治理共同体,推动村民从治理客体转化为共建主体。在公共服务领域,数字技术推动供给模式从“标准化输送”向“精准化响应”进化,通过人工智能分析村民行为数据,识别养老、教育、医疗等差异化需求,通过数据反馈机制形成“需求感知-服务调整-效果评估”的动态闭环,使公共服务始终与民生需求保持共振^[7]。

二、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梗阻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技术系统与传统乡村社会深度互构的复杂博弈。尽管技术赋能的愿景是效率提升、资源激活与治理高效,但在具体实践中,技术逻辑与乡村社会的内生性结构之间存在着多重张力,现有政策体系在数据治理、数字产权、技术伦理等领域的规制滞后,难以应对技术快速迭代引发的秩序重构,形成“技术悬浮”“价值冲突”“制度堕距”等梗阻现象。这些梗阻并非单纯的技术应用障碍,而是深层社会系统中技术理性与乡土逻辑碰撞的必然产物,折射出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一)产业发展困境

产业振兴是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源泉,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承载着亿万农民的愿景和期盼。数字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突破口,数字技术和乡村产业的深度融合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能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但其全面落地仍面临多重现实掣肘。一是设施支撑

乏力,技术落地受阻。物理层面,乡村地区存在网络覆盖不全、终端设备老旧、数据采集端口分散等问题,导致技术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始终存在断裂风险。技术层面,标准化数据平台建设滞后,不同系统间接口互认困难,形成数据孤岛与技术壁垒。运维层面,缺乏常态化的设备更新机制与技术服务体系,数字设施沦为“技术摆设”。这种基础性支撑的薄弱性,使得数字技术难以真正下沉至田间地头⁸⁹。二是主体能力薄弱,内生动力不足。乡村产业主体的数字素养构成技术赋能的根本性制约。认知维度,部分从业者尚未突破传统生产思维定式,对数字技术的价值认同存在代际差异与观念鸿沟。技能维度,智能化设备操作、数据化决策分析等新型能力普遍欠缺,导致技术工具使用效率低下。组织维度,产业链条各环节主体间缺乏数字化协作经验,难以形成技术应用合力。三是制度保障缺位,协同机制松散。政策层面,现有扶持措施多侧重硬件投入,缺乏针对技术应用场景开发、数据权益分配等深层问题的制度设计。法律层面,农产品溯源、数字产权保护等关键领域的规制空白,导致技术应用面临合规性风险。机制层面,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多元主体间的权责边界模糊,技术供给方与需求方存在目标偏差,跨部门协作常陷入“各自为政”的碎片化状态。

(二)人才培养困境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人才振兴本质上是数字技术与乡土社会人力资本的复杂互构过程。这一过程面临的核心困境是现代性数字技术与乡土社会有机体之间的内生性矛盾,源于技术理性与乡村人才发展现状之间的多重断裂,即技术工具预设的标准化、效率化逻辑与乡村人才的多样性、在地性特征存在冲突。一是数字技术与人才培

养的适配性断裂。数字技术的人才培育模式遵循“数据驱动-算法优化-规模复制”的工业化逻辑,而乡村人才培养体系根植于地方性知识传承、非正式学习网络与多元价值目标的交织之中。在线教育平台虽能突破地理限制,但其标准化课程难以兼容乡土技艺中的默会性知识。远程协作工具虽能促进知识流动,却消解了传统师徒制中“身教重于言传”的实践智慧,削弱了乡村人才培养体系的多样性与韧性。二是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转化的价值梗阻。数字技术依赖数据化的人力资本评估与流通机制,但乡村人才的价值往往嵌入复杂的社会文化网络,且因其默会性、情境性与整体性特征,在数据采集与算法建模过程中难以被简化为可量化的数据指标。此外,数据产权制度缺位使得乡土人才的知识贡献被平台无偿捕获,形成“数字剥夺”效应,使乡村人才沦为数据生产的“数字劳工”。三是技术赋权异化与社会关系重构风险。数字技术通过重构人才流动路径与价值分配机制,可能加剧乡村社会的权力分化,使掌握数字技能的青年精英加速向城市“数字迁徙”,留守群体因技术排斥进一步被边缘化,形成“技术鸿沟-人才流失-乡村衰败”的恶性循环,在实践中异化为加剧城乡人才失衡甚至瓦解乡村社会“传帮带”的传统互助网络的推手⁹⁰。

(三)文化建设困境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数字技术作为驱动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引擎,被赋予了重构乡村文化生态、激活传统资源、弥合城乡文化鸿沟的重要使命。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技术手段激活乡村文化资源、重构文化传播路径并提升文化治理效能。然而,这一过程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一是技术赋能

的工具理性与文化价值理性的冲突。数字技术的本质是效率导向的工具理性，其标准化、去中心化的特性与乡村文化的地域性、内生性存在天然张力。乡村文化作为活态传承的有机体，其价值不仅在于符号的保存，更在于集体记忆的延续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数字技术容易导致文化符号的抽离与重构，使得原本植根于乡土社会的文化意义被技术逻辑解构，形成“技术在场而文化失语”的困境。二是文化主体的数字边缘化构成了行动层面的挑战。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在于激活村民的文化自觉与参与能力，但数字技术的应用往往预设了数字素养门槛。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乡村群体普遍面临数字技能匮乏、媒介话语权缺失的现状，导致其在数字文化生态圈中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可能加剧“数字代理”现象，使外部力量通过技术手段主导文化叙事，村民反而成为文化展演的工具性存在。三是技术赋能的可持续性困境反映了制度设计的深层矛盾。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文化振兴高度依赖基础设施建设与持续运行维护，但在现有城乡资源配置机制下，往往面临资金链断裂、人才流失、技术迭代滞后等问题，导致政府偏向于短期项目推进模式，容易形成“建设—闲置—废弃”的资源浪费循环，而市场驱动的商业化路径又可能导致文化资源的过度开发。

(四)生态振兴困境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生态振兴是推动绿色发展、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在实践中仍面临多重困境。这一过程面临的核心困境源于技术工具理性与自然生态系统复杂性之间的深刻博弈，这些困境不仅是技术应用的现实障碍，更是工业文明思维与生态文明理念在乡村碰撞的必然结果。一是技术理性与生态复杂性的适配

困境。数字技术的核心优势在于通过标准化建模与算法优化实现生态要素的可计算化，但生态系统的本质是多元主体非线性互动的复杂适应系统。技术工具对生态问题的“简化”处理，虽能提升管理效率，却可能忽视生态要素间的隐性关联与动态平衡。这种“数据可见性”与“生态不可见性”的冲突，导致技术干预往往陷入“局部精准而整体失衡”的悖论。二是技术赋权与主体边缘化的治理悖论。数字生态治理的高效运转依赖村民、政府与技术平台的协同参与。但在现实层面，乡村群体面临双重边缘化困境。一方面，数字技术的话语体系由专业精英主导，村民因数字素养不足难以有效介入生态数据采集、分析与应用的全链条。另一方面，算法决策的“黑箱效应”削弱了传统乡土知识在生态治理中的合法性，导致“技术赋权”异化为“技术代理”。三是技术依赖与资源要素短缺的冲突。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振兴的可持续性依赖于技术系统的持续迭代能力与生态系统的弹性恢复能力。然而，二者在实践中存在根本性冲突。技术系统的“创新刚性”要求持续投入资金、能源与数字基础设施，这与乡村发展实际形成矛盾。更重要的是，数字技术驱动的生态产业化虽能创造短期经济收益，但资本逻辑可能加速“自然资本化”进程，最终动摇生态保护的伦理根基。

(五)数字治理困境

数字技术作为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在重构治理模式、优化服务效能、增强治理透明度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本质上是技术逻辑与乡土逻辑的深度碰撞。这一碰撞既催生了治理模式创新的可能，也暴露出诸多现实问题，集中体现为技术脱嵌、能力代差与制度迟滞的三重挑战，共同制约着乡

村治理现代化的深层转型。一是技术适配困境——数字技术与乡土社会的结构性错位。乡村社会天然具有非标准化、情境化的治理特征,数字技术高度依赖标准化、抽象化的数据建模,难以完整映射乡土社会复杂的人际网络、地缘关系与伦理规则,导致数字治理工具与真实治理需求之间产生断裂。当技术系统无法容纳乡村社会的模糊性、弹性和多样性时,其预设的精准治理效能必然被稀释,甚至可能引发治理偏差。二是数字素养困境——技术赋权与主体素养的断裂性鸿沟。数字技术赋能的本质是权力关系的技术化重构,但其效能释放高度依赖治理主体与对象的数字能力。现实中,乡村党员干部常陷入技术操作能力不足与治理经验数字转化困难的双重困境,村民群体则因年龄、教育、资源差异形成显著的“数字能力断层”,使得部分群体“数字失语”,技术赋权异化为“技术赋障”。三是制度迟滞困境——技术迭代与治理规则的异步性矛盾。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与治理制度的相对固化形成显著矛盾。传统乡村治理制度基于属地化、层级化逻辑构建,而数字技术驱动的治理创新要求跨域协同、动态响应与数据共享,二者在运行逻辑上存在冲突。且数据产权模糊、算法问责缺失、隐私保护真空等制度空白,使得技术应用面临伦理与法律的双重风险。

三、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优化路径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数字技术正逐步成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动力。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振兴已进入“全域智能”的深度变革期,应聚焦赋能过程中的现实梗阻,进行多层面的纾困引导,不断发挥数字技术的实践价值,推动数字技术同农业发展、农村治理和农民生活深度融合,为推动农业全面升级、

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让乡村振兴既有“智”又有“质”,实现从“数字覆盖”迈向“数字融合”,真正释放技术现代化的价值。

(一)加强产业数字适配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建设数字中国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已成为重构乡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键变量。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多种问题相互交织,制约着技术赋能乡村产业的深度与广度。需跳出“技术主导”的单一思维框架,构建技术赋能与乡村发展规律深度耦合的系统框架。一是夯实数字基座,贯通技术落地通道。物理层面,需推进网络信号全域化、终端设备智能化、数据端口标准化,形成立体化基建架构。技术层面,建立统一数据标准和开放接口协议,打通跨平台、跨系统的数据流通壁垒,构建互联互通的乡村数字中台。运维层面,创新“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的可持续运维模式,建立技术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确保数字化设施建得起、用得好、管得久。二是激活主体动能,培育数字内生能力。认知维度,开展多层次、场景化的数字理念宣传引导,破除传统思维定式,建立“技术即生产力”的价值共识。技能维度,构建基础操作、专业应用、创新开发一体的梯度化培训体系,通过驻村指导、云端课堂等方式提升主体技术驾驭能力。组织维度,培育数字化合作社、产业链联合体等新型组织形态,推动生产端、加工端、销售端建立数字化协作网络。三是完善制度体系,构建协同赋能生态。政策层面,建立基建投资、场景开发、服务配套的政策闭环,重点强化技术应用场景创新支持与运营服务补贴。法律层面,加快制定农产品数据确权、数字资产交易等规范,构建兼顾创新激励与风险防范的规制框架。机制层面,创新“政企农研”四方

协同模式,明确技术供给方、需求方与监管方的权责利关系,形成多元主体共建共治的可持续发展生态。

(二)完善数字人才培养体系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人才振兴的深层矛盾是技术工具理性与乡土社会人才培养之间的结构性张力。破解这一困境需构建“技术适配-制度创新-主体激活”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框架,在尊重乡村人才成长规律的前提下,推动技术逻辑从“外部植入”转向“内生共融”,重构人才培育、评价与发展体系,实现技术赋能与人文价值的动态平衡。一是构建“在地化-弹性化”技术适配体系,弥合培养体系断裂。推动技术设计从“普适性移植”转向“情境性共生”。数字技术需深度嵌入乡土知识谱系,开发支持默会知识传递的混合智能平台,将师徒制的实践智慧编码为算法辅助决策模块。同时,建立“技术、文化、生态”兼容性评估机制,避免技术简化主义对人才多样性的侵蚀,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守护人才成长的多样性。二是创新“数据确权-价值反哺”治理机制,破解价值转化梗阻。化解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的价值冲突,需构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数据治理体系。通过发展数据和价值多维映射机制,将技艺稀缺性、文化影响力等非经济指标纳入算法评估框架,避免人才价值被简化为流量数据。同时,建立数据价值反哺制度,遏制“数字剥夺”效应,形成“数字赋能-价值创造-后续反哺”的良性闭环。三是培育“数字能力-文化自觉”共生主体,激活内生发展动能。突破技术赋权异化与社会关系重构风险,需推动主体赋能从“技能培训”升级至“系统共建”,开发融合数字素养与乡土智慧的教育内容,帮助农民从技术被动接受者转型为数字和文化二元能力的共创者,确保弱势群体在算法设

计、数据使用中的话语权,防止技术赋权被异化为新的权力分化工具。

(三)构建特色乡土文化

乡土文化承载着地域群体的集体记忆与生存智慧,不仅是文化多样性的鲜活载体,更是现代社会中对抗同质化浪潮的精神堡垒。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要坚持以人为本、技术向善的原则,让数字之光既照亮文化遗产的肌理,又守护乡土文明的根脉。一是构建“价值-技术”共生机制,重构赋能逻辑。技术赋能需从单向度干预转向双向价值对话,将乡村文化的内生价值纳入技术应用的全生命周期。一方面,建立文化价值评估体系,在数字化过程中优先识别乡村文化的核心意义符号,通过技术手段强化而非消解其语境依存性。另一方面,引入技术伦理审查机制,在技术方案设计阶段嵌入文化敏感性评估,使技术创新真正服务于文化遗产而非异化改造。二是实施“主体性赋权”战略,破解数字边缘化困境。文化振兴的本质是人的振兴,需构建数字素养、参与能力、话语权力三位一体的赋能体系。在个体层面,设计梯度化数字素养提升计划,重点培育村民的数字叙事能力与文化编码技能,使其成为文化数字化进程的共同创作者而非被动接受者。在制度层面,建立文化数字主权保障机制,通过数据确权、收益分配等制度设计,确保村民在数字文化产业链中的主体地位。三是创新“可持续性治理”模式,突破制度性瓶颈。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相协同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在资源保障层面,建立文化数字新基建长效投入机制,通过专项债券、文化数字银行等金融工具实现可持续资金供给。在运营层面,探索“社会企业+数字合作社”混合运营模式,既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效率,又通过社区共治规避过度商业化风险,

最终形成外部资源输入-内生价值转化-社会效益反哺的良性循环。

(四) 开创生态建设新局面

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振兴过程中所遇到的挑战,本质是工业文明技术范式与生态文明价值诉求的冲突。开创生态建设新局面不仅是对传统环境治理模式的范式突破,更是文明形态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跃迁的必经之路。破解困局需重构技术伦理,在工具理性中注入生态智慧,在数据流动中嵌入公平正义,在制度设计中激活主体动能,使数字技术真正成为生态文明的共建者而非解构者。一是以复杂性兼容重塑技术逻辑,调和工具与生态的深层冲突。技术应用需从“简化建模”转向“复杂性兼容”,通过适配性技术设计回应生态系统的非线性特征,将数字技术定位为“生态系统的翻译者”而非“控制者”,通过增强技术对不确定性的包容能力,避免过度技术化对生态韧性的侵蚀,实现精准治理与生态规律的深度耦合。二是以参与式赋权重构治理结构,打破主体与技术的力量失衡。重构“技术-主体”的权力关系,建立村民、技术与政府的三角协同机制,在技术接入层面,开发“低门槛、高包容”的数字工具包,降低村民参与数字生态治理的技术壁垒,赋予村民生态数据所有权与治理监督权,使数字赋能从“技术代理”转向“技术共治”,激活村民作为生态守护者的内生动力。三是以韧性共生创新制度体系,平衡短期干预与长期可持续性。构建技术、生态、经济相协同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在价值转化层面,设计“去资本化”的生态价值实现路径,利用数字技术分离生态资源的“监测权”与“开发权”。在制度保障层面,完善“数字生态治理”政策体系,推动“负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制要求技术方案嵌入生态伦理

审查,建立跨代际生态影响评估制度,规避技术短期主义对长期可持续性的损害^[10]。

(五) 优化数字治理机制

乡村优化数字治理机制的必要性源于当前数字化转型中暴露的深层次矛盾与潜在机遇。优化乡村数字治理机制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破解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现实梗阻,需超越“技术至上”的线性思维,正视乡村社会的复杂性与主体性。一是技术适配,构建数字技术与乡土逻辑的兼容框架。建立“数据-情境”双向映射机制,在数据标准化采集基础上保留乡土知识弹性编码空间,构建融合地缘关系、伦理规则的本土化数字孪生模型,通过“轻量化改造”降低数字基建门槛,实施技术接口的“乡土化”改造,将方言交互、模糊决策等非结构化治理要素纳入算法训练,使数字工具既能承载技术理性,又可兼容乡土智慧,实现精准治理与柔性治理的动态平衡^[11]。二是能力共生,打造数字素养与治理需求的耦合机制。设计“分层-渐进”式能力培育体系,为基层干部开发“技术翻译”课程,重点培养数据转化、人机协同等复合能力,为村民创设“数字扫盲+治理参与”双轨培训,通过可视化界面、语音交互降低技术使用门槛。同时,建立“数字代理人”制度,由技术骨干、乡贤能人提供服务,弥合群体性数字鸿沟。三是制度更新,创设技术迭代与治理规则的调适通道。推行“制度沙盒”试验机制,在数据安全底线框架内设立治理创新特区,允许弹性调整属地原则、层级权限等传统制度要素,建立“技术伦理委员会”,吸纳技术专家、法律学者与村民代表共同制定算法审计、隐私保护等新型规则。同时,在技术理性框架内植入乡土协商、情感治理等非正式制度接口,防止治理体系陷入技术刚性陷阱。

参考文献:

[1]谭永生.数字赋能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24(1):75-86.

[2]刘学侠,宋宗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路径研究[J].行政管理改革,2024(4):64-74.

[3]唐惠敏.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发展[J].农村经济,2022(9):42-51.

[4]文丰安,卢艺.数字技术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耦合性、作用机理与优化策略[J].河南社会科学,2023(3):104-112.

[5]李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政策创新[J].经济体制改革,2022(3):77-83.

[6]陈伟雄,李宝银,杨婷.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基础、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J].当代经济研究,2023(9):

99-109.

[7]水宏,何永林.数字治理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进路[J].湖南社会科学,2024(2):75-84.

[8]张梦娣,涂勤.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发展:历程回顾、现实挑战及未来展望[J].山东社会科学,2024(5):130-137.

[9]曾祥明,胡元.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关键点与发展进路[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43-53.

[10]陈弘,王清贵.数字技术赋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基于整体性分析框架[J].生态经济,2024(6):179-184.

[11]朱战辉.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与运行机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173-184.

责任编辑:马俊

(上接第 8 页)

[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15]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16][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M].殷陆君,编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17]陈云文选: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江泽民文选: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9]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

建人民出版社,1992.

[20]王玉堂.卓越领导力[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

[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22]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凝心聚力推动改革行稳致远[N].人民日报,2024-10-30.

责任编辑:朱少家

长三角一体化下安徽人口流动与高质量发展研究

周清 王泽强

(安徽省委党校,安徽 合肥 230022)

[摘要]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内在的关系,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为长三角大规模人口流动创造了条件,也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机遇。当前,安徽人口流动还处于净流出状态,人口流动对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进程、劳动力供给、新型城镇化以及创新驱动与转型发展等方面产生深刻影响。对此,安徽应紧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充分发挥人口流动对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效应。

[关键词]长三角一体化 安徽 人口流动 高质量发展

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内在的关系,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下人口大规模流动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由于沪苏浙的虹吸效应,长三角一体化下人口流动也会对安徽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进程、劳动力供给、新型城镇化以及创新驱动与转型发展等方面产生一些影响。对此,安徽应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扬皖所长,推动人才政策迭代升级,加快人口回流,吸引和集聚高层次人才,增强安徽高质量发展动能。

一、长三角一体化下安徽人口流动的基本情况

2023年末,全省常住人口6121万人,同2020年安徽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6103万人相比,共增加18万人,年均增加6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0.1%。2022年末,

全省常住人口6127万人,户籍人口7120.8万人,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比值为0.86,与2010年的0.87相比,略有下降;人口净流出比值从2000年的4.15%提高为2010年的13.29%以及2022年的13.95%,人口外流程度趋缓。在深度融入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安徽与沪苏浙的人员交流十分密切。从外出人口流向看,安徽流动人口70%以上分布在沪苏浙。

近年来,安徽通过深度参与长三角创新共建、协调共进、绿色共保、开放共赢、民生共享的发展实践,加快了沪苏浙相关产能向安徽转移,安徽利用的省外资金主要来自长三角地区的沪苏浙。2023年,沪苏浙在皖投资在建亿元以上项目3789个,实际到位资金8743.4亿元,同比增长7.2%。沪苏浙向安徽大规模投资和转移产能,既能吸

收稿日期:2024-11-19

作者简介:周清,中共安徽省委党校经济师。王泽强,中共安徽省委党校教授。

引一部分在当地务工的安徽流动人口回流，同时也提升了安徽对外省流动人口与人才的吸纳能力。

二、长三角一体化下安徽人口流动的影响分析

人口是经济活动的基础，人口合理增加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红利。人口增加主要源于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当前，人口生育率下降导致人口自然增长机制受阻，基于人口净流入的人口机械增长，则可为流入地发展提供巨大红利。反之，人口净流出则会对流出地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目前，与沪苏浙相比，安徽对人口、人才及资金等资源要素的吸引、集聚能力还相对偏弱，人口流动对安徽高质量发展也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

（一）人口流动影响劳动供给，人口红利衰减

市场机制、政策干预与社会福利等因素所造成的区域发展差异是影响安徽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2023年，安徽GDP为4.71万亿元、人均GDP为76830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893元，分别相当于江苏的36.74%、51.05%和66.24%，浙江的57.02%、61.44%和54.67%，上海的99.79%、40.37%和41.13%。目前，安徽与沪苏浙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居民收入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对人才的吸引及聚集能力还不足，受长三角发达地区的虹吸效应影响较大，安徽青壮年劳动人口与高素质人才更容易流向沪苏浙。

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安徽人口向外流动规模仍然较大，人口聚集的内生能力相对不足，劳动力供给能力下降。根据2010年和2023年的人口数据来看，安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呈下降趋势，15-59岁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从2010年的67.21%下降为2023年的61.65%；15-64岁人口的占比则

从2010年的71.84%下降为2023年的66.78%，支撑安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呈衰减趋势。

（二）青壮年人口迁移外流，人口老龄化加剧

2023年，合肥、滁州、芜湖、马鞍山等市人口净流入，铜陵人口流入与流出基本持平，而省内其他各市则均为人口净流出。通常情况下，迁移流动人口具有年轻化特征。青壮年劳动人口的大量外流会从两个方面影响安徽人口年龄结构：一是降低了青壮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相应地提高了老年人口比重；二是降低了人口出生率和未成年人口比重，又进一步提高了老年人口比重。总之，长三角一体化下的人口流动与净流出，加快了安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加深了人口老龄化程度。

自2000年以来，安徽老年人口总量和占比就在持续提高，人口老龄化逐年加深，社会抚养压力不断加大。2023年安徽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5.87%、老年抚养比23.75%，与2010年相比分别提高了5.64个百分点和9.54个百分点。目前，安徽人口老龄化进程已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养老服务资源供求矛盾突出，“未富先老”与“未备先老”特征明显。

（三）人口城镇化市民化加快，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近年来安徽人口城镇化进程较快，并且在未来一个时期，安徽的城镇化水平还存在着一定的提升空间。那么，随着安徽城镇人口规模扩大，实施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持续推动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以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十分迫切。

在安徽人口城镇化快速推进中，随着大量青壮年农业转移人口进城以及全面三孩

政策的实施，在城镇特别是市区的孕产妇以及婴幼儿数量不断增加，对孕期保健、住院分娩等妇幼保健服务需求较大，并对学前教育、义务教育等社会公共服务资源供给产生多层次、多方面的压力。有效缓解社会公共服务资源供求矛盾，还需要不断提升城市生育保健、医疗卫生、学前和中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的供给能力。

(四)人才竞争日趋激烈，招才引智难度加大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才资源，当前，城市竞争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对人才资源的争夺。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各城市为了吸引人才，纷纷出台富有竞争性的人才政策措施，展开人才争夺战。由于上海及苏浙两省城市的人才政策通常要比安徽城市的更具有竞争优势，安徽各城市在招才引智工作方面面临着较大挑战。

目前安徽在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等方面与沪苏浙还存在较大差距，安徽的不少城市特别是皖北城市的招才引智难度仍较大。这意味着，安徽城市特别是皖北城市必须出台更强有力的人才政策措施，积极应对“双招双引”和聚集高端人才方面的各种挑战，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

三、以人口流动促进安徽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充分利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机遇，准确把握长三角一体化下的安徽人口流动、人才竞争、科技创新及产业发展方向等方面的新动向、新特点，加大高层次人才吸引力度，推进人才发展平台建设，建设青年友好型城市，促进劳动力资源聚集，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提供丰富的人力与人才资源保障。

(一)扎实推进“双招双引”，加快创新驱动发展

积极推进“双招双引”，将招商引资和招

才引智有机结合起来实施市场化引才激励，推动科学引才、靶向猎才，为安徽高质量发展聚势赋能。密切跟踪产业创新方向，围绕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重点产业链，制定“双招双引”路线图，积极推动安徽与长三角发达地区的对接协调，加快推动项目签约、合作共建和人才培养，把积极引育长三角区域内的大项目、好项目和“高精尖缺”人才(团队)有机结合起来，在长三角范围内实现产业链与人才链有效融合。

在“双招双引”中，加强与长三角区域内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主动对接省内外优质创新资源，积极探索在长三角区域内设立“研发飞地”的有效路径和建设模式，创新“研发飞地”支持政策，支持安徽企业在省内外就地引进、使用高端人才，将“研发飞地”打造成为安徽招才引智的重要形态，加快实现与长三角创新链、人才链的有机融合。加快推动长三角科技成果在安徽落地转化，推动实现研发在外、转化在皖，通过驻地招才、异地研发、本地转化，把安徽打造成为长三角科技成果转化重要基地。

(二)加强人才发展平台建设，积极聚集高端人才

紧密围绕安徽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势主导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加强人才发展平台建设，强化产业引领作用，积极为各类人才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长三角区域内高端人才，常态化选派优秀党政干部赴沪苏浙挂职锻炼，努力提高安徽人口和人才聚集能力，推进人力资源、人才资源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激发高层次人才投身于安徽高质量发展的热情，加快推动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全力打造安徽高层次人才、青年人才引进工程等人才引育品牌，积极探索“人才团

队+科技成果+政府参股+股权激励”模式,扶持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落户安徽,积极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加强政策保障引导,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徽商回归”,通过“引凤还巢”,大力支持徽商企业家回皖创业兴业。建立高层次人才信息库、完善人才服务机制,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积极打造人才集聚“强磁场”,做到既“引得来”,也“留得住”,更“用得好”。

(三)营造创新创业良好环境,建设青年友好城市

为了更有效地吸引、聚集八方有为青年来安徽创新创业,通过加快推进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过程中更多地融入青春元素,积极营造浓厚的亲青、惠青氛围。建立促进青年人口收入持续增长机制,加快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技能人才、专业技术人员等青年群体迈进中等收入群体行列。优化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教育环境和就业环境,保障其基本住房需求,缓解青年婚恋、生育、养育等难题。

不断完善青年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评价、流动及激励机制,积极营造有利于青年人才的发展环境和成长空间,围绕安徽重大发展战略实施和城市发展总体规划,鼓励年轻人才在重大工程建设中、重大任务前挺身而出、攻坚克难,激励年轻人为安徽高质量发展建功立业,推动城市与青年共赴高质量发展。积极发挥年轻人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畅通和丰富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和方式,培养基层治理青年人才队伍。

(四)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城镇化质量

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即实现“城镇”与“人口”的协调互动发展。安徽还需不断提升城镇化质量,加快推进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健全人口落户制度,加大教育投入和人力资本投资,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农村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综合素质,加大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力度,加强医疗健康服务,增加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完善农村转移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体系,破解农村转移流动人口面临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及社保等问题,留住和善待进城的农村转移流动人口。

(五)促进城乡人口双向流动,畅通城乡融合渠道

在长三角一体化及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安徽还需要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建立健全城乡之间的“人、地、钱”等资源要素的畅通交换、双向流动的政策体系,促进要素更多地向乡村流动,从而为安徽农业、农村和农民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活力。通过建立城乡人口自由双向流动的畅通渠道,有效破除农民进城和人才入乡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城乡人口流动与融合发展,增强安徽城乡、区域高质量发展动能。

一方面,要加快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配套政策体系,确保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得下、稳得住;另一方面,加快建立城镇人口及长三角跨市域人口能够向安徽乡村流动的制度性通道,完善乡村地区人才引进、培养、使用、评价和激励机制,允许返乡就业与创业的相关人员在原籍或在就业创业地落户,并保障其能够享受相关权益。在农村承包地、宅基地确权和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基础上,构建和完善城乡一体化要素市场化流动、配置机制,拆除农村“围墙”,让安徽城镇人口、长三角跨市域人口以及非农村集体的人、财、物能够深度参与安徽农村农业的生产活动。

责任编辑:徐书琴

构建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 驱动逻辑、现实梗阻与实践进路

刘雅静

(宁夏区委党校,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从价值、结构和技术驱动逻辑来看,构建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无疑是持续增强基层社会安全韧性的必要之举,但其在构建过程中仍存在诸如社区居民公共精神与责任意识相对缺失、行政权力边界模糊、数智技术驱动存在悬浮化等问题,需要从凝聚公共价值共识、厘清公共权力边界、发挥数智技术外在驱动力作用等方面入手,稳步推进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建构。

[关键词]社区 风险治理 共同体

当前,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域下,随着各类显性、隐性及潜在风险因子的累积,多元化风险的高发频发与衍变扩散在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层面激增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夯实国家安全和稳定基层基础”^{[1]53}。这一要求为借助国家治理结构的纵向延伸,将各类风险隐患防范化解落实到基层社区治理场域提出了明确的目标指引,进而以社区居民共同价值和公共利益的凝聚,有效统筹风险的常态化与非常态化治理需求,持续增强基层社会安全韧性。鉴于此,本文立足于社区

风险治理共同体建构的研究视角,以风险治理体系的重塑和优化为基点,深入探讨社区层面风险治理的行动逻辑,为从社区这一关键场域认识和把握各类风险隐患,以共同体思维探索有效防范与化解风险的路径提供必要借鉴。

一、构建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的驱动逻辑

(一)价值驱动:从隐性的个体向共同体转变的社区风险治理理念重塑

中国传统意义上群体权利重于个体权利的意识在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进程中逐步被消解,在此过程中,社区风险治理的脆弱

基金项目:中共宁夏区委党校(宁夏行政学院)招投标课题“有效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研究”(立项编号:24DXZB01)。

收稿日期:2024-11-21

作者简介:刘雅静,中共宁夏区委党校决策咨询部(研究室)教授。

性也进一步凸显。一方面,在社会的整体结构性转型过程中,个体的自主意识趋于强化,个体主义日益盛行与群体精神逐渐式微之间的潜在矛盾,导致隐性的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张力持续增大,在风险治理中缺乏共识性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区风险治理体系的良性运转。另一方面,在充斥着诸多不确定性的现代风险社会中,在各种多源性、复合性风险因素持续输入的情境下,孤岛式的个体面临着更多不可控的情况,有可能遭遇更为多样化的风险,仅凭自身力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产生的个体无力感和焦虑感极为普遍。借助共同性力量满足个体的安全需求,也因之成为有效防范、应对风险的“最优解”和长远之计。质言之,在变革与风险共存的当下,基于风险日益常态化、普遍化这一客观事实,作为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切实有效的实践依托,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建构是高度契合现实情形和需求的价值选择,其能够在秉持协同、合作思维的前提下,引导个体超越狭隘的自我短期利益,培育共同体精神,确立息息相关、共同承受、合作应对的价值导向,在共同的价值诉求和行动准则的引导下主动参与到社区风险治理行动中,积极融入共同体内部,从社区风险共同治理场域中获得更强烈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这样的治理参与理念与行动映射出了个体在面对风险时的主动选择,也彰显了共同体对推动基层社会安全体系跃迁升级的牵引效应。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遵循互嵌联动、良性耦合的平衡逻辑,使个体间彼此分离、各行其是的无序状态向相互信任、协力合作的有序状态转变,从而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张力变为合力,并使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形成深入持久的相融共生关系。这也进一步凸显了以共同体思维推进社区风险治理的现实价值,即通过及时性动员和敏

捷性参与,打通隐性个体之间的阻隔来弥补传统风险治理范式的“缺口效应”,进而增强风险防范化解和应对处置的基层社会凝聚力。

(二)结构驱动:从中心-边缘到多维互嵌的社区风险治理结构转换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提速,社区作为各类风险因素的孕育、生发、集聚和传导空间,承载着突发情境下骤然增加的风险治理需求和压力,也因之成为风险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但由于思维和体制惯性的影响,在社区风险治理实践场景中,主体呈现出单一化的结构样态,表现为过度依赖于权责分明、组织严密的政府行政力量的部署与推动,而作为“吹哨人”的社区力量更多处于“政治化”服从与配合的地位。换言之,受制于传统的政府中心主义治理逻辑,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长期以来处于一种被忽视的境况,致使政府-社区风险治理系统呈现出中心-边缘式的结构化矛盾,社区处于风险治理体系的边缘化位置,与其在整个社会安全韧性格局中的重要性明显不匹配。这样的运作结构一方面导致政府自上而下的决策、指令可能面临实施乏力、落实不力等问题,另一方面也使得基层社会的内生性责任培育尚未与共同抵御风险的需求相匹配,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社区层面的风险治理短板效应。实质上,现代风险作为各种要素互动耦合、共同作用的产物,对我国传统的以政府中心主义为特征的风险治理结构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在越来越多复合型、叠加型、系统型风险的扰动下,这种一元主导的刚性治理框架渐露疲态,其风险治理成本偏高、存在碎片化治理困境、社会动员力不足、缺乏延展性等缺陷也逐渐显露无遗。而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既重视政府在政策支持、资源配置、组织动员等方面不可或缺的“元作用”

的有效发挥,又关注以社区居委会和居民为主体的多元治理力量的实质性参与,变压力体制为参与体制,通过政社之间的相互信任和深度联结,以实践驱动力将社区场域内分散式存在的力量和资源积聚整合起来,更有效发挥基层社区风险治理的覆盖性、灵活性优势,进而将风险共治行动嵌入多元主体行动网络,充分释放社区的风险治理效能。近年来,随着政社关系的互动与调适,各类资源进一步向基层下沉,与之相对应,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正当其时,因其本质正是要超越传统风险治理的中心-边缘结构,化解政府-社区风险治理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和主体参与差序化难题,塑造多元主体共在共生的开放型风险治理框架,依托主体间的互动协作,共同应对、抵御和化解各类风险。

(三)技术驱动:从传统到数智的社区风险治理技术赋能

在现代风险社会与数字智能时代叠加的双重背景下,社区风险治理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使得传统应急管理模式的局限性日益凸显,而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加速迭代和嵌入赋能为社区风险治理形态的转型升级带来了全新机遇,也为解决传统风险治理实践中存在的“防不胜防,控不得控”难题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相较于传统风险治理模式,数智技术应用在打通数据壁垒、收集风险信息、共享应急数据、整合各方资源、促进协调联动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具体而言,在风险预警监测阶段,借助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实时收集、研判相关风险隐患信息,实现风险的动态感知与及时预警;在风险应对处置阶段,可借助各类已搭建的数字风险治理平台综合分析研判应急预案、应急物资储备以及应急救援数据等,在此基础上,及时作出应急响应,并

以数据的共通共享实现纵向与横向的组织协同联动处置;在灾后恢复阶段,可依托全周期监测数据建立相关风险评估模型,总结归纳风险应对处置经验并提出合理可行的灾后恢复建议。近年来,伴随着国家层面对数字化转型在各类治理场域赋能的日益重视,各级地方政府在推进社区风险治理数字化转型方面的资源供给力度也在持续加大。在此背景下,将依托数据、算法、算力等激活的各种数智化治理方案有机融入社区风险治理场域,以科技赋能的形式,借助数智技术的资源链接与信息感知优势,既能够实时捕捉、识别、分析、研判、预警社区层面的潜在风险,又可以通过对各类风险信息数据的快捷传递与有效共享,促进多元治理主体间的横向联通与纵向贯通,切实增强社区层面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的风险共治效能。

二、构建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的现实梗阻

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蕴含了现代风险社会对“共同体”理念与价值的追寻,但在建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换言之,作为立足基层社会场域的风险防范化解机制,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能否成为新的社会联结纽带,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现实梗阻的回应与突破。

(一)社区居民公共精神与集体责任意识的相对缺失

就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的本质而言,其首先表现为一种价值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建构需要以社区居民普遍遵循的公共精神准则及责任意识等为基本支撑和保障,公共价值与责任伦理也因之成为构建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价值内核。但从现实情况来看,社区居民公共价值认同的普遍缺失与集体责任感的相对淡薄已成为社

区风险治理的梗阻因素。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领域由封闭固化型向开放多元型、由同质一体型向异质分散型的急剧变迁,价值取向的个体化、社会结构的松散化、行动方式的自主化等特征日益凸显,与此相伴而来的是公共德性与公共价值信念的淡化,进而导致价值维度去权威化、去公共化倾向的日趋明显以及公共性与个体性之间冲突的相对加剧,导致个体权利意识超越甚至碾压共同体价值认同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区居民参与风险治理行动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社区居民的集体责任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在个体意识影响下,加之对新兴的城市商业型社区缺乏价值归属和情感认同,私人领域的优先级普遍被置于社区公共领域之上,社区居民更为重视维护自我权利与实现自我利益,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则相对较低,往往呈现出人心淡漠、行动涣散、卸责避责等相对消极一面。公共价值认同的失衡和集体责任伦理的缺失导致社区居民缺乏介入风险治理集体行动的内在动力与热情,这在相当程度上对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建构形成了严峻挑战。

(二) 行政权力边界模糊阻碍社区风险治理效能提升

在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的理论建构中,多元主体在共有价值取向的引导和共同制度规则的约束下,在民主协商、取得共识、协同合作的基础上,成为社区风险治理集体行动体系的参与者,最终凝聚为功能耦合、优势互补的有机共同体。因此,在共同体语境下,政府与社区及居民之间应摒弃传统的博弈思维,塑造一种协商、互动、协作的共生关系,寻求相生相随的协同治理路径。事实上,这种多元主体联动的结构也正是建构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的理论意向

和实践意蕴所在。近年来,各级政府向基层下沉式投放的治理权限和应急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社区的活力,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格局初步形成,但更多表现为多元主体在外在风险压力下的临时性被动合作,使得此类治理实践仍存在一些明显的短板,如权责边界设置较为模糊、多元主体衔接不够顺畅、社会力量按需被动补位、风险治理合力相对松散等,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社区居民的主体性身份认同,导致社区风险治理联动的“碎片化”和“不均衡”,难以促成内生性集体行动网络与风险共担格局,导致社区风险治理体系转型难以从根本上突破强行政、弱治理的困局。整体而言,传统单向度、全能型风险治理的制度惯性以及行政权力过密化的治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部门遵循科层制运行逻辑、运用强制性权能影响社区力量功能发挥的障碍性因素,未能促成各类治理主体与要素的全面统筹、有机融合与协调联动,进而又在无形中阻滞了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的一体化整合进程,甚至产生风险共担失灵和风险共治失序等现象。

(三) 数智技术驱动存在悬浮化等短板

数据、算法、算力和各种新技术开辟的共治平台、激活的互动场景,已成为构筑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坚实支撑。在数字技术应用的起始阶段,各地政府将推进重点置于市县层面应急数据库构建、条线应急系统打造等方面,积极推动各类应急治理平台上线,但因未能结合市县特色和功能需求等进行因地制宜的布局,导致同质化治理平台泛滥^[2],同时散落在各平台上的信息数据资源也未能实现在纵向与横向维度的完全打通、有效整合与实时共享,使得“数据隔离”成为基层社区风险治理中难以破解的现实难题,进而导致风险防范应对的最佳时机被延误,降低了社区风险防控

的整体效能。为解决这一问题,地方政府将应急治理平台进一步延伸至社区层面,但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仍存在诸多短板,如:部分社区虽进行了数字化尝试,但因资金投入较大、数据收集交换和共享难度大以及与市县治理平台不兼容等原因,仅停留在数据的汇集与展示阶段,风险信息传递仍主要依靠电话、微信群等渠道,风险隐患的分析预判、统筹应对、资源调度等深层次功能受到一定限制;部分社区综合性数字治理平台在风险源的监测、预警以及信息数据的联通、传递、共享、分析等方面的应用不足,平台统筹性不强,部分治理平台在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时甚至出现失灵情况。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在数字素养、数智理念及数字技术应用方面大多缺乏专业性,在应对复合型风险的数据信息收集、传递和上报等环节仍习惯采用传统方式,对社区场域隐含的各类风险隐患监测、研判和预警等环节的技术治理手段应用明显不足,未能深入挖掘并充分发挥数据资源的价值,不善于运用相关数据信息和数智治理平台进行前瞻性风险预警和研判,在及时有效传递风险变化信息方面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三、构建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进路

(一)凝聚公共价值共识,为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建构提供强大精神动能

以共同体思维和理念推动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价值意蕴,突出体现在以打通多元主体力量之间的阻隔来破解传统风险治理范式的碎片化与不均衡难题,进而形成风险应对的整体性合力。一是当前迫切需要从夯实公共精神基础入手,厚植互助共享的社区公共文化基底。以更具韧性的共同体文化塑造和前瞻性、建设性、引领性话语体系,积极引导社区居民走出原

子化困局,重建社区公共性,使风险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成为普遍共识和自觉行动。为此,社区党委和居委会应为居民拓展更多的互动公共空间,如可借助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广场等承载居民的交往互嵌和沟通交流功能,进一步黏合社区联结的纽带,同时,在相关公共活动举办中应当有意识地强化社区公共价值规范^③,如可通过制定居民公约等形式,鼓励居民在日常交往中自觉遵循并积极维护以互帮互助、互惠互利、崇尚合作、互相监督为轴心的正式规范,重塑社区信任网络。在此过程中,以必要的情感支撑重塑并逐步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与凝聚力,为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铺展开人与人之间高黏度的协作网络,进而有效激发居民在风险情境下参与集体行动的内生动力,使其主动承担相应的治理责任,积极介入社区风险治理实践,实现在复杂、多源风险情境下社区层面动态的自组织、自适应。二是在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的整体性建构图景中,以崇尚协作共生和“公共利益至上”的价值导向和共同体叙事,矫治社区居民的自我中心主义及差异化、分众化等观念取向,凝聚价值共识,倡导超越完全基于自身利益可能引起的狭隘与偏私,树立正确的公共责任伦理导向,通过互动、协商、合作的方式,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尽可能拓展并积极维护社区整体利益,进而为构筑稳定的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和进一步提升风险治理质效提供基础性社会支撑条件。三是在个体意识彰显与集体行动需求的动态平衡与有机联结方面,在社区风险治理中既需尊重居民个体的独立性与主体性,又应以公共精神价值共识的培育与风险治理参与制度的设计使其有效融入治理框架,实现风险治理过程中权力与权利、共同体与个体的有机联结,形成风险共担、应急互助的集体价值共

识,提升集体协作效能。

(二)厘清行政权力边界,为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建构提供良好社会生态

如上文所言,社区风险治理过程实质上是政府、基层组织、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基于目标共识,遵循共同使命,相互调适、互动合作的动态过程。在此种风险治理场景下,必然要求政府与社会之间形成同频共振关系,汇聚社区风险治理的合力。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的本质在于超越传统风险治理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为多主体参与社区风险治理提供规范化指引和合法性支持,在此基础上,塑造多元主体共在共生的风险共治框架,依托主体间的互动协作,共同应对和化解社区场域各类多源性、复合型、不确定性风险。当前,迫切需要提升社区风险治理效能,逐步优化基层社区风险治理的行动规则,进一步明晰多元治理主体间的权责关系,有效整合科层体系与多中心体系的各自优势,凝聚社区风险治理的多元主体力量,从根本上破解治理主体结构失衡的困境,推动社区风险治理体制从“行政独揽型”向“多元共治型”转变,实现多元主体的常态化合作治理。为此,一是作为构建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关键主体,各级政府部门要意识到,在进一步强化主体间协同共治的目标导向下,面对社区风险场景,应急资源、多方力量的整合必须嵌入更具行动性的风险治理框架。具体而言,在理念层面,各级政府部门需秉持“大治理观”,切实消除对社区基层力量的“他者”化歧视,收回“全能”触角,突破传统的理念限制,以整体性、综合性思维将社区风险治理多元主体统筹为一个有机整体。在实践层面,政府部门要主动克制自身实施行政化整合的治理冲动和路径依赖,把握好集权与赋权、分权的合理尺度,为多元治理主体构筑制度化、集成化、简约化参

与网络和风险共治框架。此框架应以风险共担、安全互系、信息互通作为具体支撑点^④,以有效的政策激励与责任约束机制作为促进治理互构的重要依托和制度保障,进而以行政化手段与社会化手段的有机融合,使社区基层组织在风险隐患排查、资源汲取链接等方面的天然优势得到更为有效的发挥,及时阻断各类风险的传导链条和转化通道。二是激发社区居民的主观能动性,有效发挥其风险治理基础主体作用。伴随着风险的持续发展与演化升级,社区居民的配合度与参与度将会被有效激发,他们不再处于被参与、被动员的消极状态,转而会以更为积极主动的治理主体身份、良性耦合的治理方式,有力推动社区风险隐患群防群治格局的形成,由此构建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机结合的权责互补格局和社区安全新体系。因此,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应通过社区应急预案的优化完善及安全教育、应急技能培训等途径,赋予社区居民明确的风险治理责任主体地位,增强其理性化参与能力;另一方面,应发挥基层社区的自觉性、灵活性等优势,通过及时性动员,引导社区居民有序参与风险预警、应急响应、灾后恢复等环节,将蕴藏在居民端的治理潜力进一步挖掘整合,实现社区居民主体力量的实质性“在场”,进而显著弥补政府单一主体政令型治理模式的短板^⑤,以更高的效能、更低的成本实现基层社会的安全、稳定与有序。

(三)发挥数智技术外在驱动力作用,为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建构提供先进工具支持

在风险社会来临与数智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技术的深度嵌入与有效赋能成为构建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极为重要的方法支撑和工具支持。换言之,进一步整合社区层面各类数字信息资源,打造基于数智

化风险防控与安全服务的社区风险治理平台,更好链接社区内外部主体力量,助推社区风险隐患的全过程数智化治理,进而稳步推动数字化治理体系的形成,已成为构筑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必不可少的要素保障。与此种发展态势相对应,当前在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构建的过程中,一是需要持续加强社区智能化、综合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优化部署社区物联网感知设施、风险因子与数据采集分析系统以及涉及应急设施、应急物资、避难场所的各种智能终端设备,进一步筑牢“物联-数联-智联”三位一体的社区风险治理的数智底座^①,实现全方位立体化覆盖和快速化响应,为多元化风险防控应用场景开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保障服务。二是建立健全社区基础数据采集与更新机制,打造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基础数据采集归集和共享对接平台。关注不同社区在地理特征、居民结构等方面的异质性,以居民的公共安全需求为根本导向,围绕社区风险预防应对的难点、痛点和堵点,适当调整数字智能化治理技术引进与应用方案,以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前沿和核心数智技术的强有力嵌入,更好发挥数据和基层网格的双重作用。一方面,适时、全面进行社区场域风险隐患的排查和识别,科学评估、研判风险走势;另一方面,打破社区风险治理系统的数据壁垒,从根本上解决信息多头报送、效率低下等难题,进而显著提升技术赋能与社区风险治理体系的契合度。三是增强社区的数字韧性,将基层社区作为智慧城市和“城市大脑”的神经末梢,打造“上下联通、纵横一体”的数智治理平台,涵盖风险防范、预警、响应及处置全周期,借助高效的数据联通与共享,进一步增强该平台对社区内外部应急资源的统筹性,使社区基层组织在风险预防和危机应

对环节,能够依托平台迅速进行业务整合,充分调动内外部资源,提升社区层面的风险抵御力。四是将数智技术应用能力纳入社区工作人员考核范畴,强化相关激励机制建设,进而吸引更多具备数智技术应用技能的专业化人才的加入。此外,应尽快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的数智技术学习与考核评估机制,定期组织社区工作人员数智技术应用培训与考核活动,持续提高这一群体的数字素养和驾驭数智工具的能力,进而将数智技术应用更有效地融入社区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应急资源统筹调配等环节,从而以更强的技术迭代动能助推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的精细化建构。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张丽娜,谢新水. 风险视域下如何建设韧性社区治理共同体:目标、路径与任务——基于政治-价值-技术三维驱动的分析[J]. 学习论坛,2024(5):59-67.

[3] 赵时雨. 社区韧性:社区风险治理中的结构张力及因应调适 [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52-65.

[4] 杨睿智.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话语叙事与实践创新——一个政治学整合性解释框架 [J]. 社会科学研究,2024(4):23-35.

[5] 徐顽强. 基层应急治理效能优化:赋权模式、内在机理与实现逻辑 [J]. 求索,2021(1):130-140.

[6] 赵峥,常含笑. 城市数字治理:逻辑框架、风险情景与优化策略[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8):1-6.

责任编辑:徐书琴

网络圈层化的技术逻辑与治理路向

王亮亮 贺美然 高慧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网络圈层化是伴随着互联网技术而发展起来的网络空间交往的新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技术逻辑:网络通信技术奠定了物质基础、社交媒体架构提供了组织形式、算法推荐技术营造了群体文化氛围、大数据分析技术锁定了潜在目标用户。就其影响来看,网络圈层化虽能满足个体的精神需求,但也会导致“圈地自困”,阻碍信息流通。为推动网络空间良性发展,需优化算法设计、加强平台管理、强化技术监管。

[关键词]网络圈层化 技术逻辑 算法推荐 治理路向

在数字化时代,互联网已深度嵌入了人们的生活,重塑了社会交往与信息传播的模式。网络圈层化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现象,表现为不同群体在网络空间中基于各种因素形成的相对封闭的、具有独特文化与行为特征的圈层。这种圈层化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多种网络技术协同作用的结果。深入研究网络技术与网络圈层化的关系,对于把握网络时代社会结构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一、网络圈层化的内涵及特征

恩格斯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

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结起来的画面。”^{[1][2]}事物的联系是极其复杂的,由此形成不同的生态系统。不同层级的系统往往因其内部构成的不同而组成各种“圈子”,网络圈层化就是“圈子”在网络虚拟空间的具象化过程,它兼具“圈子”的一般特征和网络的特殊性。

(一)网络圈层化的内涵

“圈层”概念最初源于地质学领域,用以描绘地球内部结构,如地壳、地幔、地核等

基金项目:2023年度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科研项目“人工智能背景下‘00后’大学生劳动观培育研究”(立项编号:23QNRWP02);2024年度陕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整体主义视域下大中小学思政课内容有机衔接的困境及破解路径研究”(立项编号:SGH24Y3206);2023年度陕西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煤炭类高职院校‘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研究”。

收稿日期:2024-11-22

作者简介:王亮亮,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贺美然,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辅导员。高慧,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圈层,以及外部的水圈、生物圈等。后来,“圈层”概念被引入社会学领域,在社会学语境下,“圈层”被用来代指社会中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社会地位、价值观念、兴趣爱好、生活方式的特定群体。群体内部成员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与互动,同时与其他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界限与差异。网络圈层化是指在互联网环境下,网民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价值观念、消费习惯、身份认同等因素,在网络空间中自发形成或主动选择特定圈层,并在其中展开频繁信息交换与社交活动的现象与趋势。

“网络信息化时代,现实中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特定的‘群’,人们以自身的兴趣爱好、价值取向等为基点形成不同的圈层群体,按照自己所认同、所选择的圈层思维来生活。”^[2]传统社交圈子主要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网络圈层打破了传统限制,更多地以兴趣、认知等现代性元素作为划分标准。在网络世界中,无论身处何地,只要对某事物具有相同兴趣,即可加入相应圈层。网络圈层成员构成更为多元化,不受地域、年龄、职业等因素限制,成员间交流也更为便捷、频繁,借助网络平台可随时随地分享信息、交流观点。

(二)网络圈层化的特征

1.文化生产同质化。在网络圈层中,具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价值观念等成为成员间紧密连接的关键纽带,进而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团体。成员基于共同的兴趣与目标,在文化生产过程中形成合作模式,按照团队的目标,通过集体智慧与协作,创造同质化的文化产品。

2.信息获取定制化。算法推荐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用户在网络上获取的信息愈发定制化。各大互联网平台依据用户的浏览历史、搜索记录、点赞评论等行为数据,分析用户兴趣偏好,进而为用户推送契合

其兴趣的信息,导致用户在网络上所见内容大多为契合自我心理需求的信息。

3.社交圈子阻隔化。网络圈层化致使不同圈层之间的信息交流与人员流动受到一定阻碍。不同网络圈层之间存在显著的认知差异,由此形成一种圈子“鄙视链”的层级现象,导致圈层层级分化明显,这种阻隔加剧了社会群体间的分化,对网络社会的和谐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二、网络圈层化的技术逻辑

网络圈层化的形成离不开技术建构,网络通信技术、社交媒体架构、算法推荐技术以及大数据分析技术在其形成过程中相互配合,共同催生了网络圈层化现象。

(一)网络通信技术为网络圈层化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网络通信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使圈层化从现实领域拓展到了虚拟空间,为网络圈层化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使网络圈层的多样化得以实现”^[3]。网络通信技术凭借其高带宽、低时延、广覆盖的技术特性,在物理层面构建起信息高效传输与交互的基础网络体系,为网络圈层内部成员间的信息互通与资源共享提供了物质载体,奠定了网络圈层化的物质基础。

(二)社交媒体架构为网络圈层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组织形式

社交媒体架构依托其独特的多节点连接体系、精细化的用户关系管理机制以及个性化的社群搭建模式,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塑造出复杂而有序的社会网络拓扑结构。此结构借助对用户兴趣图谱、社交关系链的深度挖掘与整合,为具有相似兴趣偏好、价值观念或社会背景的用户群体提供了高效聚类与聚合的组织范式。社交媒体架构作为一个融合多种技术的复杂生态系统,为网络圈层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组织形式。

(三) 算法推荐技术为网络圈层化的形成营造了群体文化氛围

算法推荐技术通过对用户浏览历史、行为偏好、交互数据等多源信息的深度学习与智能算法分析,精准洞察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与潜在兴趣趋向,为不同网络圈层用户推送高度契合其文化品位与价值取向的信息内容。尤其是深度学习算法,通过构建复杂的神经网络模型,能够实现精准推送。这种个性化内容推送,使用户在圈层内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从而为圈层文化氛围的形成奠定了群体心理基础。

(四) 大数据分析技术为网络圈层化的形成锁定了潜在目标用户

大数据分析技术凭借其对海量、多源、异构数据的高效采集、存储、清洗以及深度挖掘能力,从宏观与微观双重维度对用户群体展开精细化画像与行为建模。从宏观维度看,大数据通过对大量用户数据的分析,可了解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群体的整体兴趣趋向与行为模式。从微观维度看,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精准识别每个用户的偏好与潜在需求。通过精准的用户画像,大数据分析技术为网络圈层化的拓展与延伸提供了精准的市场引导,切实有效地锁定了网络圈层化形成过程中的潜在目标用户。

三、网络圈层化的治理路向

“‘圈层化’是网络社群发展的最新趋势”^[4]。网络圈层化的形成既有主观人为偏好因素,又有客观的技术塑造因素。网络圈层化对于满足个体精神需求、深化认知、缓解压力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圈地自困”、认知片面等负面影响。网络技术在模型构建、机制建设等方面的滞后放大了网络圈层化的负面影响。对此,我们必须正视技术、妥善利用,“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网络引导舆论、反映民

意的作用”^{[5]335}。

(一) 优化算法设计,实现供给多元

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近11亿人(10.9967亿人),较2023年12月增长742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8.0%。与网络共生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任何人都不能置身事外。在多种负面因素的作用下,有些网络技术比如算法,游离了正确的轨道,成为网络圈层化的有力助手,不断推送同质化的信息,加固圈层边界,促使社会成员“圈地自困”。在此背景下,只有优化算法设计,才能为消除信息孤岛作出有益贡献。

1. 消解信息茧房。为有效消解信息茧房,亟须引入多元推荐算法,对现有的信息分发机制进行系统性重塑。新的算法设计应突破传统的单一用户偏好维度,在推荐内容的生成过程中,科学合理地纳入异质信息元素。通过设置合理的权重与概率分布,使推荐内容在满足用户核心兴趣需求的同时,适度引入来自其他领域、具有不同观点与视角的信息,以此打破圈层间的信息壁垒,拓宽用户的认知边界,促进跨圈层的信息交互与理解,推动网络信息生态朝着多元化、均衡化方向发展。

2. 提升算法透明度。算法黑箱问题一直是网络信息传播领域的关键难题。由于算法的复杂性与不透明性,用户难以清晰理解内容推荐机制背后的逻辑与依据,这不仅削弱了用户对算法推荐结果的信任,还为算法滥用创造了潜在空间。提升算法透明度已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按照社会公平正义与群众具有知情权的一般原则,平台有责任与义务向用户披露算法的基本原理与大致的推荐逻辑,增强算法决策过程的可解释性。同时,构建完善的用户反馈机制至关重要。用户作为算法推荐结果的直接接收者,能够敏锐感知推荐内容

是否合理。借助用户对不合理推荐内容的反馈数据,平台可以实时调整算法参数,优化推荐模型结构,不断提升推荐结果的合理性与公正性,使算法更好地服务于用户的信息需求,保障用户的知情权与公平获取信息的权利。

3.嵌入价值观导向。将主流价值观融入算法内核,是引导网络内容生态实现良性、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举措。在网络内容的传播过程中,算法扮演着“把关人”的角色。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来看,掌握算法这一传播工具并把握其价值导向至关重要。因此,在内容审核环节,应充分运用算法构建全面、精准的价值观评估体系,对拟推荐的内容进行前置性筛查。基于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视频分析等先进技术,对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的内容进行深入的语义分析与特征提取。通过建立与主流价值观相契合的语义模型与特征库,准确识别内容中是否含有暴力、色情、极端思想等。一旦发现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内容,立即实施拦截措施,将其排除在推荐流之外,从源头上净化网络信息环境。

(二)加强平台管理,设置游戏规则

网络平台针对不同属性圈层要制定差异化、精细化的行为规则与管理规范。

1.建构圈层规则。由于不同圈层成员在兴趣爱好、目标诉求、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适配不同的规则体系十分必要。平台在用户进入圈层的初始阶段,应通过弹窗、系统提示等方式,向用户详细告知相关规则,并在圈层界面的显著位置进行长期公示,确保规则的可见性与可获取性。鼓励用户积极举报违规行为,实现对违规行为的及时发现与快速纠正。搭建高效的违规举报平台,充分利用圈层内用户相互监督的机制优势,依据既定规则体系,对违规用户采取分级处罚措施,以此维护圈层的

正常秩序,保障圈层内大多数用户的合法权益。

2.促进圈层融合。随着网络圈层化趋势的加剧,圈层之间的隔阂与极化现象逐渐凸显,对网络社会的和谐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平台作为连接不同圈层的枢纽,通过举办跨圈层活动,能够搭建起不同圈层之间沟通与交流的桥梁,有效缓解圈层极化现象。跨圈层活动的设计应充分考虑不同圈层的特点与需求,整合线上线下多种资源,设置多元化的活动形式。例如,组织主题讲座,邀请不同圈层的专家、学者分享各自领域的前沿知识与独特见解;举办创意作品展览,展示不同圈层的创新成果,促进知识与创意的跨圈层传播。打破圈层之间的心理壁垒与信息壁垒,增进不同圈层用户之间的相互认知与理解,拓展用户的社交网络边界,促进知识、文化、价值观在不同圈层之间的融合,培育包容、多元、开放的网络文化生态,推动网络社会的协同发展。

3.强化内容审核。在网络信息爆炸的时代,平台面临着海量内容的管理挑战。加大内容审核力度,构建全面、严格的内容审核体系已成为平台管理的重要任务。审核范畴不仅要涵盖明显违法违规的内容,还应重点关注那些容易引发圈层冲突、传播不良情绪、破坏网络生态平衡的潜在风险内容。对于带有煽动性、刻意挑起圈层对立的言论,平台应及时采取删除、屏蔽等措施,切断其传播路径,并对发布者予以警告,以起到警示作用。同时,引入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内容审核,利用深度学习算法对海量内容进行快速筛查,构建大规模的内容特征库与分类模型,在短时间内对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的内容进行精准分类与风险评估,确保平台内容的积极健康、向上向善,为用户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三)强化技术监管,开展有序互动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普及,种类众多的数字媒介塑造了多种形式的“圈层”交往空间,这一空间是“由一个相互交错或平行的网络所构成的大系统”^[6]。在这一系统之中,良莠混杂,为了实现网络空间良性互动,有必要对网络信息进行细致甄别和监管。

1.搭建监管技术框架。政府相关部门作为网络空间的监管主体,构建专门针对网络技术的动态监管体系迫在眉睫。在网络圈层化进程中,网络通信技术、算法推荐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等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与挑战。运用网络流量监测技术,对网络通信中的数据传输量、传输速率、数据流向、异常流量波动等关键指标进行实时监控。通过建立流量基线模型与异常检测算法,及时发现数据泄露、非法网络活动、网络攻击等安全隐患,保障网络通信的安全与稳定。借助算法审计技术,定期对平台算法进行全面、深入的合规性审查。从算法的设计原理、数据使用方式、推荐结果的公正性与透明度等多个维度进行评估,确保算法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运行,防止算法被滥用,维护用户的合法权益与网络空间的公平正义。

2.完善法律法规体系。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与网络圈层化现象的日益复杂,现有的法律法规已难以满足网络空间治理的实际需求。与时俱进,不断更新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成为必然选择。制定专门针对网络技术应用与网络圈层管理的法律法规,明确界定平台、企业与用户在网络圈层化过程中的权利与义务。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与制裁机制,为网络圈层治理提供坚实、可靠的法律依据,不断提升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水平。

3.推进国际合作治理。网络技术的发展

与网络圈层化现象具有鲜明的全球性特征,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难以独自应对其带来的诸多挑战。加强国际的合作与交流已成为必然趋势。各国政府与相关国际组织应积极协同,共同制定国际网络技术监管标准与网络圈层治理规范。在网络技术监管标准方面,统一数据安全标准、算法合规标准、网络隐私保护标准等,消除因标准差异导致的监管漏洞与套利空间。在网络圈层治理规范方面,明确跨国网络活动的行为准则、信息传播规范、纠纷解决机制等。构建跨国网络技术监管合作机制,在打击跨国网络犯罪、遏制不良信息跨境传播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通过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技术协作等方式,汇聚全球治理资源,形成治理合力,共同应对挑战,营造安全、有序、和谐的国际网络空间,推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2]张铨洲.“入世与出世”:青年群体网络“圈层化”的困与策[J].中国青年研究,2022(3):89-94.
- [3]罗琳.青年网络“圈层化”的时代特征、生成机制与风险防控[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2(3):75-83.
- [4]王嘉,吕君怡.“圈层化”下的青年网络爱国主义[J].探索与争鸣,2021(3):115-123.
-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6]肖鸿.试析当代社会网研究的若干进展[J].社会学研究,1999(3):1-11.

责任编辑:徐书琴

中央苏区时期革命文化传播载体研究

隋秀英 魏扬明

(辽宁师范大学,辽宁 大连 116029)

[摘要]载体作为革命文化传播的中介,是承载和传递革命文化信息、连接传播主体与客体的重要桥梁。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增强革命文化在群众中的传播效果,实现启发苏区群众的阶级觉悟、激发革命热情、巩固和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夺取土地革命战争胜利的目标,围绕革命文化传播的载体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这一时期,党的革命文化传播载体主要包括学校教育、革命图文、文化娱乐活动等三种类型。系统梳理和研究中央苏区时期党的革命文化传播载体建设的伟大实践,能够为新时代推进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高质量开展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

[关键词]中央苏区时期 革命文化 传播载体

革命文化传播载体是传播主体为实现一定的传播目标而选择并运用的、承载革命文化信息的中介工具。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1][39]}革命文化传播载体的选择与运用,直接决定了革命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效度。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传播载体是进行革命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

和有效手段,是保障革命文化内容直达群众的关键环节。基于此,党紧密围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这一中心任务,结合革命文化传播内容及主客体实际情况,选择了行之有效的传播载体,主要包括学校教育、革命图文及文化娱乐活动等。事实充分证明,只有各种传播载体密切配合、协调联动,党的革命文化在苏区工农群众中的影响力才能不断扩大,党在工农群众中开展的革命文化传播工作才能收到良好

基金项目: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历史经验视角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研究”(立项编号:19BKS186)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24-11-22

作者简介:隋秀英,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魏扬明,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效果。

一、以学校教育为载体开展革命文化传播

学校教育是指通过创办学校,招收各类学员作为培养对象并以班级教学形式系统地对学员进行思想文化教育的一种载体。中央苏区时期,党领导的学校教育不仅承担着提高苏区群众文化素养和思想政治觉悟的任务,还肩负着为苏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培养高素质领导干部及专业技能人才的重要使命。

(一)党政干部学校的革命文化传播

党政干部学校主要为满足党在领导苏维埃运动过程中对政权建设、党的建设、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等方面干部人才的需求而设立。通过系统化、组织化的革命文化传播,党政干部学校培养了大批合格的干部,满足了苏区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根据性质划分,党领导创办的党政干部学校有如下两种类型。

一类是以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等为代表的综合性干部学校。以1933年成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为例,该校以“学习马克思主义,总结亲身革命经验,提高政治思想水平”^[1246]为建校宗旨之一,并确立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自修为主与重点讲解相结合。检验学习成果的方法,不仅要在课堂考试,而且要深入实际进行实习”^[13113]的教育方针。在班级设置方面,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主要开设三种类型的班级:第一种是以训练高级干部为主的高级班,每班40人,学习时间为6个月;第二种是以新苏区工作人员为主的初级班,每班80人,学习时间为2个月;第三种是专门针对党团组织的干部培训班,每班50人,学习时间为4个月。学校紧密围绕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这一中心

任务开展教学工作,开设的课程主要包括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及党的建设等。在教学方法上,学校坚持自主学习与重点讲解相结合的方法。对于需要重点讲解的课程内容,学校会专门邀请党的领导干部到校进行授课。例如,陈云、刘少奇讲授“职工运动史”,成仿吾讲解“政治常识”等。此外,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还会不定期通过组织学术讲演会来对在校学员进行革命文化宣传教育。例如,董必武、张闻天就曾在讲演会上分别作过“巴黎公社”“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现在和未来”等专题报告。

另一类则是以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无线电学校等为代表的专业性干部教育学校。例如,1934年成立的高尔基戏剧学校,以“栽培苏维埃戏剧运动与俱乐部、剧社、剧团的干部,养成苏维埃文艺运动的人材”^[14146]为办学目标。鉴于学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能看书看报的,也有一字不识的”,且年龄差别也很大,“有七八岁的,也有三四十岁的”,故学校开设普通班、地方班和红军班三种班型。高尔基戏剧学校规定学员学制为四个月:第一个月以政治问答、唱歌、跳舞、演活报剧(不识字的学员还须学习文化)为学习内容;后三个月则以政治常识、俱乐部工作和戏剧理论为主修内容^[5250-251]。经过系统学习,学员在毕业时革命文化素养显著提升。在奔赴工作岗位之后,他们积极投身苏区戏剧运动,有不少学员成长为部队或地方剧团的骨干力量。

(二)红军干部学校的革命文化传播

红军干部学校主要通过系统的革命文化宣传教育,使红军指战员在掌握作战指挥相关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深入把握战争和军队建设规律,从而提升其作战指挥能力和军队思想动员水平。根据创办主体的

不同，党领导下的红军干部学校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一类是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红军步兵学校、游击队干部学校等由中央军委领导创办的军事学校。以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为例，该校以培养中级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政治素养和军事能力为主要任务。在学习科目设置上，学校开设了政治科、指挥科和参谋科，其中政治科主要开设党的纲领和政策、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常识、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等课程。

另一类则是由各根据地自主创办的军事学校。以闽浙赣苏区创办的赣东北红军彭杨军事政治学校为例，该校在招生时实行严格的选拔制度，主要从苏区青年学生中择优录取，要求学员日常表现良好，且通过文化考试和体检。学校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革命理论素养，课程设置主要涵盖军事、政治、文化等领域。其中，政治课程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重点，包括《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等重要文献。苏区红军干部学校通过开展系统化的革命文化宣传教育，使红军指战员的革命文化素养和政治理论水平显著提升、牢固树立起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为红军输送了大批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突出的干部人才。

(三)工农群众学校的革命文化传播

工农群众学校旨在通过开展革命文化宣传教育，保障苏区工农群众受教育权利，唤醒群众的革命意识，提升其文化素养与政治觉悟，从而夯实革命斗争的群众基础。党创办的工农群众学校，以列宁小学为主要形式，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青少年儿童群体，以培养革命斗争的接班人与苏维埃建设的新生力量为主要任务。1933年10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印发的《小学教育

制度草案》中指出：“在工农民主专政下的小学教育，是训练现在参加民主革命斗争的后代，同时在这基础上准备将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现在和将来绝对不可分离。用共产主义的文化教育，作斗争的工具，同时用斗争，做文化教育的工具，斗争和教育，绝对不可分离。教育以劳动为本位，与生产紧密地联系着，劳心与劳力，绝对不可分离。小学教育不分性别与社会的差别，一概施以免费的强迫教育。”^{[64]9-420}苏区小学教育紧密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展开，坚持为苏维埃政权建设、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服务，致力于满足青少年群体的革命文化需求，培养苏区巩固发展所需的革命战士和先进知识分子。同时，列宁小学还尤为重视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置于教学工作的核心位置。1933年10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印发的《小学课程与教则草案》指出：“政治水平要达到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因为儿童目前是参加阶级斗争的一员，同时是共产主义未来的后辈，所以政治水平必要达到能了解阶级斗争一般的理论和策略，就是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64]21}此外，苏区在编印新教材时，注重破除旧的思想传统，通过植入革命文化的内容深入开展思想斗争，以提高学生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水平。例如，《共产儿童读本》第六课《迷信》中写道：“迷信是封建的附属物，是欺骗贫苦工农和剥削工农的一种东西，是豪绅地主骗人的把戏。……我们革命群众应该起来反对。”^{[7]689}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苏区时期的革命文化传播活动是在严酷的革命斗争条件下开展的，上述三类学校教育载体覆盖人群难免有限。为此，苏区党和群众在克服困难兴办上述三类正规学校教育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兴办社会教育，以满足更广大群众对

革命文化的需求。例如,党通过组织各类训练班,开办夜校、补习学校,建立读报社、图书馆等文化传播机构,有效提升了苏区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的文化水平。经过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共同努力,以长冈乡为例,全乡共有夜学九个,“学生平均每校约三十二人,九校共约三百。男约百分之三十,女约百分之七十。全乡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青年壮年共四百一十三人,大多数进了夜学,四十五岁以上的‘老同志’也有少数来读的。群众非常欢迎,说‘夜学顶好’。”^{[18]307} 识字班也取得了良好效果,“过去不识字的,现在都识得四五十个字了,少数能识七八十个。”^{[18]308} 全乡共有俱乐部四个,每村一个。可见,中央苏区时期,党领导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协同推进,使广大学生系统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在思想上受到革命文化的熏陶,逐步领悟了革命道理,坚定了革命信念,激发了强大的革命热情。

二、以革命图文为载体开展革命文化传播

革命图文是通过线条、图案以及文字等生动的表意符号传播革命信息或表达特定革命意义的载体,也是党开展革命文化传播中使用最广泛的一种载体。中央苏区时期,为了以生动活泼、通俗化的形式向群众传播深刻的革命道理,提高革命文化传播的影响力,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丰富多样的革命图文载体。其中,革命书刊和标语口号是苏区革命文化传播中运用较广泛的两种。

(一) 出版革命书刊传播革命文化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革命书刊的出版发行工作。一方面,党在重要决议及文件中系统谋划和部署了相关工作,指出“党报是领导全党的斗争、组织广大群众在党的政治主张周围的一种最重要

的武器。……建立完善的党报应看成是党的建立工作重要的一部分”^{[19]636},明确了武装斗争形势下出版革命书刊的重要性。1930年1月8日,中共福建省委在给闽西特委及红四军前委的信中,对闽西苏区的革命书刊出版发行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要求闽西苏区党组织在领导革命斗争过程中,要“建立经常的出版刊物(半月刊或旬刊),内容登载鼓动而浅显的文章,及党的理论和策略的简白说明。建立新闻性质的日常刊物,登载群众斗争情绪、苏维埃底下群众生活及各地消息来鼓动群众。”^{[10]22}1931年,中共中央又先后专门就党报工作作出决议,要求党报在革命斗争过程中要致力于“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党在群众中影响的有力的工具,成为群众的组织者。”^{[9]29}同时,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部必须加强对党报的领导,“各级党部负责同志必须彻底了解,给党报担任做文章,实是他的实际工作中的有机一部分与最重要政治任务之一。”^{[9]259}

另一方面,党在革命实践中创办了大量革命报刊。据不完全统计,苏区党、军队和苏维埃政府创办革命报刊多达200余种。其中,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创办了《红色中华》《斗争》等10种报刊;苏维埃中央政府及政府部门创办了《苏维埃文化》《教育通讯》等13种报刊;红军创办了《红星报》《红军报》等41种报刊;中央群众团体创办了《青年实话》《列宁青年》等17种报刊。此外,各地方省级党政军群团报刊、特委级党政群团报刊及县级党政群团报刊分别多达38种、56种及29种^{[11]81-100}。与此同时,苏区党在领导开展革命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不仅积极翻译编印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文本著作,还废止了国民党党化教材,由文化部门编印出版具有革命意义的新教材,并组

织群众因地制宜“在各乡村各城市创办当地的小报，编辑各种最通俗的小册子”^{[9]336}。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创办的这些丰富多样的革命书刊不仅有力推动了党的革命理论传播，广泛宣传了党的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也有效唤醒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革命与阶级意识，坚定了其革命必胜的信念。毛泽东同志在“二苏大”报告中曾明确指出，苏区群众革命文化运动的迅速发展，我们也可以通过报纸的发行得出结论，“中央苏区现在已有大小报纸三十四种，其中如《红色中华》从三千份增至四万份，《青年实话》发行二万八千份，《斗争》二万七千一百份，《红星》一万七千三百份”^{[5]82}，证明群众的革命文化水平是迅速地提高了。

（二）以革命标语口号传播革命文化

革命标语口号以其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的特点，成为党推动革命文化在群众中间快速传播的重要载体。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革命标语口号的重要作用。建党之初，党在第一个《决议》中就明确提出，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一切日报、书籍、传单和标语的出版工作”^{[12]4}，由此开启了用标语口号传播革命文化的序幕。红军创建初期，由于敌人封锁和根据地条件艰苦，尚不具备完善的报刊出版和发行条件。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11]35}他因地制宜，创造性地提出综合运用标语口号、传单布告、壁报简报等多种形式开展好宣传教育工作的主张^{[13]7}。1928年，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文字宣传，如写标语等，也尽力在做。每到一处，壁上写满了口号。惟缺绘图的技术人材，请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来。”^{[11]67-68}可见，革命标语口号是党进行革命文化传播的又一重要载体。

中央苏区时期，党的革命标语口号按存在形式可分为“石壁、碑刻、墙体、桥板、立柱、横幅、布告标语”等十余种。按其内容划分，有以下几类：其一，宣传党的革命路线、方针及政策，扩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这类标语有：“拥护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万岁！”“共产党是真正为工农谋利益的政党”等。其二，宣传红军性质、宗旨与任务，提升人民军队在群众心目中的影响力。这类标语有：“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红军为无产阶级而战”“红军为消灭资产阶级而战”等。其三，动员群众参加红军，扩充红军队伍。这类标语有：“扩大红军，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劳苦工农自动起来当红军”等。其四，开展土地革命宣传教育，号召群众团结起来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这类标语有：“实行土地革命万岁！”“彻底平均分配土地”等。其五，宣传巩固发展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类标语有：“建设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府”等。此外，还有反帝反封建及对敌统战类型的标语，如“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欢迎白军士兵来当红军”等。这些革命标语口号广泛传播了我党我军的革命主张，扩大了党和人民军队的影响，有效激发了群众的革命觉悟，汇聚起了广泛的革命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央苏区时期，由于群众多是未受过教育的农民，因而在开展革命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为使革命文化易于理解和接受，增强革命文化对群众的吸引力，党在运用革命书刊、宣传标语等载体的同时，也大量使用漫画、墙报等生动形式进行宣传教育。据统计，《红色中华》作为中央苏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在其总计出版发行的324期中一共刊载了141幅漫画和宣传画。此外，还有诸如《红星画报》《革命

画集》《支前漫画》等专门以画叙事的报刊也为有效传播党的革命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14]。

三、以文化娱乐活动为载体开展革命文化传播

文化娱乐活动是党为实现革命文化传播目的,以群众为主体,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将革命文化融入其中,使群众在参加活动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的一种载体。中央苏区时期,尽管面临严酷的革命斗争形势,党仍组织开展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活动,使群众在深刻理解革命何以必要的基础上,直观感受苏维埃政权的人民性和革命成果的共享性,有效提升了苏区民众投身革命的积极性、主动性及对革命战争的支持力度。这些文化娱乐活动按照其开展的普遍程度及活动性质,可分为文艺类和节日类两种类型。

(一)以革命文艺活动传播革命文化

中央苏区时期,党领导创建的各革命根据地多位于偏远的边界、山区,当地群众约90%为文盲,思想文化水平普遍较低。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在通过学校教育和革命图文传播革命文化的同时,立足苏区群众具体实际,通过开展形象直观、生动有趣的文艺活动,有效提升群众的思想觉悟和革命文化水平。早在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就明确指出红军宣传教育工作中存在的诸多不足,其中包括:“革命歌谣简直没有;化装宣传完全没有;含有士兵娱乐和接近工农群众两个意义的俱乐部没有办起来”^{[15]744-745}。1930年,闽西苏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问题决议案》也明确指出:“各区乡应尽可能开办阅报社、俱乐部;各县应组织新剧团,经常出发表演新剧;新剧本须经区以上之政府审查方得演出”^{[16]14-15}。1931

年,随着苏区巩固壮大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在各级党组织及苏维埃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下,革命文艺活动类型日益丰富。

就革命文艺活动的呈现形式而言,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文艺理论指导下,对苏区内带有封建色彩的文艺表现形式进行改造。其中,革命戏剧和革命歌曲是党在这一时期领导开展的较有代表性的文艺表演形式。在革命戏剧方面,苏区的戏剧运动坚持大众化方针,明确提出戏剧“要大众化,通俗化,采取多样形式,为工农兵服务”^{[10]143}。苏区的革命戏剧内容丰富多彩,既有《农民自叹》《谁给我的痛苦》等反映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斗争的作品,也有《打宁都》《活捉张辉瓒》等表现苏区革命战争的作品。这些戏剧作品对提升苏区广大工农群众的思想觉悟、引导他们拿起武器走上武装斗争道路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革命歌曲方面,中央苏区地处闽、粤、赣三省边界,这里是客家人聚居区,以喜爱编唱民间歌谣而闻名。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歌曲这一苏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将党的革命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融入其中,创作出一系列朗朗上口、易于传唱的革命歌曲。例如,《工农剧社社歌》唱到:“我们是工农革命的战士,艺术是我革命武器。创造工农大众的艺术,阶级斗争的工具。为苏维埃而斗争!暴露旧社会的黑暗面,指示新社会的光明,创造题材与故事英雄,就在革命与战争,赤色革命的战士。”^{[16]20}苏区的革命歌曲按其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动员群众反抗剥削压迫、参加革命斗争的歌曲,如《工人苦》《战争动员山歌》等;二是反映苏区生产建设蓬勃发展的歌曲,如《插秧曲》《提早春耕歌》等;三是颂

扬党和红军光辉形象及反映苏区良好干群关系的歌曲,如《红军歌》《苏区干部好作风》等。除革命戏剧和革命歌曲外,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还通过编排革命舞蹈、创作革命诗歌、组织文艺晚会等形式向群众传播革命文化。可以说,苏区的革命文艺活动是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大众化文艺活动,以其丰富的革命思想、通俗的语言表达和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深受广大苏区群众欢迎,成为党团结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二)以革命纪念节日传播革命文化

革命纪念节日是以重要革命人物、事件为对象,借助于一定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和规范的仪式活动,传递革命思想理论、凝聚人心的一种载体^[17]。中央苏区时期,党高度重视利用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纪念日,通过举办革命纪念活动对广大群众进行革命文化宣传教育,实现团结动员群众参加革命的目的。

一方面,中共中央通过在重大节日印发相关纪念活动的决议及通知,推动革命文化在苏区的传播。例如,193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明确指出:“一切纪念节在苏区都应该是广大的宣传鼓动的日子。比如‘三一八’应该是宣传与鼓动反对白色恐怖,发展济难会的日子……一月二十一日应该是列宁纪念周,大规模征收党员的日子等等。”^{[19]338-339}1932年,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分别于9月19日和12月31日印发了《关于非苏区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节运动的决议》和《关于“一二八”周年纪念的通知》,号召各地党部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决性和顽强性,向广大群众“广泛的解释苏联和平政策、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和发展,与宣传中国苏维埃红军才是真正的

反日反帝的领导者与组织者。”^{[18]661}1933年,中共中央在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和“九一八”二周年纪念日之际,印发相关决议,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向群众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反日反帝斗争思想。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高度重视利用苏区创办的革命报刊报道党的革命节日纪念活动,以扩大革命纪念节日在群众中的影响。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为例,据统计,1932年至1934年间,该报纸围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革命纪念节日活动,发表了多达305篇报道性文章^[19]。可见,中央苏区时期,革命纪念节日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向群众传播革命文化、组织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重要平台和载体。中国共产党通过在革命纪念节日组织相关活动,深入剖析革命事件,使人民群众了解革命的目的和性质,在思想上明晰革命的必要性及重大意义,树立起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积极投身武装斗争,保卫苏维埃运动的胜利果实。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来之不易、弥足珍贵,是做好今后工作的重要遵循,一定要认真总结、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20]16}系统梳理和总结中央苏区时期党的革命文化传播载体建设的经验,对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优化革命文化传播载体建设具有多方面启示。新时代,我们要进一步强化学校载体建设,构建学校革命文化的传播机制,充分发挥学校在传承与弘扬革命文化中的主阵地、主渠道作用;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推进革命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创新革命文化传播样态,使革命文化融入群众的日常

生活；聚力打造以革命文化为主题的文化项目，注重利用重要时间节点、重大纪念活动开展革命文化传播，不断丰富革命文化传播的实践载体。总之，高度重视革命文化传播载体建设，既是保障中央苏区时期党领导的革命文化传播工作取得卓越成效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成功开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宝贵经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借鉴党领导革命文化传播载体建设的宝贵经验，发扬优良传统，大力弘扬革命精神，为凝聚全党全社会共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持久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李小三.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 [3]欧阳恩良.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1921-1949)[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 [4]苏区教育资料选编(1929-1934)[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 [5]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办公室 福建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办公室.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
- [6]张挚，张玉龙.中央苏区教育史料汇编(上)[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7]张挚，张玉龙.中央苏区教育史料汇编(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0]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 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1982.
- [11]刘云，等.中央苏区宣传文化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3]张友南，等.中央苏区的红色文化[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
- [14]谭琪红.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载体研究[D].南昌大学，2015.
-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6]汪木兰，邓家琪.苏区文艺运动资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 [17]万秀丽，刘晶莹.纪念仪式：增强红色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9(6):40-44.
-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9]张泽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重大节日纪念活动述论(1932-1934)[J].苏区研究，2018(6):49-58.
- [20]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责任编辑：马俊

无产阶级从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的内在逻辑

——基于马克思“1852-1858年间英国政论文章”的分析

白宇乔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摘要]在 1852 至 1858 年间分析英国社会的一系列政论文章中,马克思阐释了无产阶级从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的内在逻辑:金融贵族是当时英国的统治力量,垄断着国家政权,支配着财政、政府、军队以及社会舆论,残酷剥夺和镇压无产阶级。金融贵族寡头的阶级专制是这种统治的实质,两党制下的轮流执政或联合执政是其表现形式,这种寡头专制不可避免地引发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和军事危机。工业资产阶级虽成为资产阶级的中坚力量,但限于阶级狭隘性而丧失了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并与贵族走向合流,共同剥夺无产阶级。劳资矛盾的极端尖锐是无产阶级斗争转向的根源,在寡头专制的严酷与经济斗争的失利的共同作用下,无产阶级转向了夺取国家政权、建立阶级专政的政治斗争道路。

[关键词]英国政论文章 金融贵族 寡头专制 英国无产阶级 政治斗争

1852年2月至1858年9月,马克思广泛研究了英国的政局变动、工商业危机、工人运动等领域的状况,重点分析了主要政党和阶级组织。英国议会中的党派主要有托利党、辉格党、曼彻斯特派、皮尔派、爱尔兰旅等,托利党代表传统的大地主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的利益,辉格党代表金融贵族等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曼彻斯特派主要

代表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其他派别主要为这三者的附庸。金融贵族是真正的统治者,无论国内外形势如何变幻,金融贵族寡头的专制统治都不曾动摇。寡头专制与无产阶级斗争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理解同时期马克思的英国政论文章的逻辑主线,更是理解英国无产阶级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的逻辑主线。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研究”(立项编号:18BKS087)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24-11-19

作者简介:白宇乔,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贵族寡头对英国的统治

近现代英国的统治阶级是大资产阶级贵族,核心是金融贵族寡头。“贵族”不再是封建制度下依靠亲缘延续的领主、军阀或高利贷主,而是资产阶级化的金融贵族、土地贵族以及贵族化的工商业巨头。贵族寡头在英国处于支配地位,统治并剥夺中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专制统治严重阻碍社会进步且他们不会自行让出政权,由此他们也成为无产阶级主要的斗争对象。

第一,贵族寡头的社会支配性地位。统治英国的核心力量是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寡头,“‘国家’,这是土地贵族和金融巨头联合统治的化身”^{[1]63}“不列颠宪法……实际上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一切决定性领域居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和正式执政的土地贵族之间的由来已久的、过时的、不合时宜的妥协。最初……参加妥协的只有一个资产阶级派别——金融贵族”^{[2]187-188}。当时的贵族寡头专制主要通过辉格党和托利党轮流执政的两党制来体现,托利党是土地贵族寡头的代表,是“地租的狂热的拥护者,……和其他资产者的区别,也就等于地租和工商业利润的区别。”^{[3]416}辉格党是金融贵族寡头的代表,是“由英国最古老、最富有和最傲慢的土地占有者构成的……是资产阶级即工商业中间阶级的贵族代表。”^{[3]418}贵族寡头掌握着绝大多数地产和货币,占据着公职和军职,垄断着政权,利用金融投机、制定政策和有组织的暴力等方式掠夺社会财富,通过代议制建立起一整套“英国的专制统治”^{[2]267},无产阶级的活动场域就是这个披着君主立宪制“政治狮皮”的贵族寡头专制社会。

第二,贵族寡头对无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的剥夺。贵族寡头的剥夺是寄生性的,

他们不是靠生产而是靠投机、寻租、欺诈和掠夺来维持统治。“一个民族的工业高峰是在这个民族的主要任务还不是维护利润,而是谋取利润的时候达到的。就这一点来说,美国人胜过英国人。”^{[4]10}贵族寡头的剥夺就是寄生性的“维护利润”,他们利用财政和公债进行投机,与工业巨头联合压榨工人、农民和小企业主,将危机转嫁给全社会。迪斯累里首相的税收改革实质是“补偿地主的损失……解除了农场主目前的一部分税负,把它转嫁给了人民群众”^{[3]574}。格莱斯顿首相的国债和财政提案则是“创立一个对有钱阶级和商业阶级有利的新的金融手段……对减轻国债毫无帮助……这一措施只对伦敦城的商人们有利,而人民则要为其付出昂贵的代价。”^{[1]65}是“把负担转嫁到不富裕阶层身上……富商将会付得少一些,然而,不太富裕的小店主在先前他可以不用交直接税的那些情况下也必须纳税了。”^{[5]73}农民阶级也逃不过被盘剥,“工厂主、乡绅和组成不取报酬的审判官的特权阶层”^{[6]612}对农民的裁判权实质上是“现代化了的、得到宪法掩护的领主裁判权”^{[6]612},农民普遍遭受强迫劳动和高额罚款。

第三,贵族寡头对政权的垄断。国家政权是阶级斗争的核心,贵族寡头虽然分为相互争斗的不同派系,但目标都是维系对政权的垄断。“资产阶级——其实只是中间阶级的上层——一般也在政治上被承认为统治阶级……议会两院实际立法的权力都牢牢掌握在土地贵族手里……贵族虽然屈从资产阶级所提出的某些原则,却独自统治着内阁、议会、国家管理机关、陆军和海军”^{[2]188}。内阁长期被寡头把持,上院是贵族聚集地,下院也受到贵族的权钱操控,政府和军队也由贵族主宰。“自从1688年‘光荣

革命’以来,除了若干次短期的中断……执掌国务的一直是辉格党,……力图保持自己世袭的寡头政治乃是辉格主义的唯一特征。”^[3419] 贵族寡头垄断政权的核心途径是控制国家财税,通过制造各种晦涩的财政政策使国家始终是赤字状态,并通过让国家负债、区别性征税等方式转嫁损失给全社会,“世上没有什么比所谓财政更带欺骗性了。擅长这门‘神秘科学’的术士们把有关预算和国债的最简单的业务蒙上一层难懂术语的外衣,掩盖着种种浅薄的花招……这些令人厌恶的生意经和一大堆不胜枚举的琐碎规定,把公众完全给弄糊涂了;而每一种这样的新的财政把戏,却为高利贷者提供一次求之不得的加紧进行害人的掠夺活动的机会”^[167]。

第四,贵族寡头对国际关系的操纵。贵族寡头垄断着外交和殖民地事务,其对外政策的根本目的是防止欧陆发生革命并蔓延至英国。面对俄国扩张,寡头们忧虑的是“同俄国的战争意味着丧失它对政府的垄断权”^[25],对外政策的实质是“牺牲英国的民族利益来满足他们特殊的阶级利益”^[125]。贵族惧怕欧陆革命会威胁他们的国内专制,于是“让东方羽毛未丰的专制制度得到加强,以期为他们在西方的虚弱的寡头政治赢得支持”^[125]。寡头选择支持封建势力如俄国,纵容其领土扩张和民族压迫,打压波兰等地的民族解放运动,“1830-1854年的全部外交活动归结起来不外是一个原则:不惜任何代价避免同俄国发生战争。”^[26] 寡头们还残酷剥夺印度等殖民地,侵略波斯、缅甸、中国等,用对外扩张维系国内专制,“老一套的财政把戏已经把8亿英镑的国债强加在人民肩上。这些国债主要是为了阻止美洲殖民地的解放和反对上个世纪的法国

革命而发行的。”^[162] 贵族寡头的对外政策在造成巨大灾难的同时也暴露了自身缺陷,帮助无产阶级认清谁是真正的敌人。

第五,贵族寡头对社会舆论和意识形态的控制。贵族控制的各报刊起着制造和操控社会舆论的作用,《泰晤士报》《纪事晨报》《每日新闻》等虽代表不同的寡头集团,但都想遮蔽无产阶级的声音、维护寡头专制。面对金融危机时,各家报刊不顾十分明显的诸如公司大面积破产的征兆而“硬要我们相信危机的最坏时期已经过去”^[788]。在宪章派利用选举进行游行和演讲时,诸如“你们不会在伦敦任何一家属于统治阶级的大报上找到厄内斯特·琼斯的演说”^[3427] 这样的情况是常态。在利用报刊这种软实力的同时,寡头也不吝使用军警的硬实力。1855年6月,工人因反对不合理的“禁止星期日交易法案”而在伦敦海德公园大规模集会,贵族指示警察局镇压、殴打并逮捕与会者,“以国家政权、法律……的形式出现的,这一次反抗它们,就意味着造反”^[6388]。寡头还用“民主”去粉饰专制,“民主的实质,即财富的增长,这种财富的智力的增长,以及它的通过舆论和合法的机构来影响政府的要求的增长。由此可见,民主正是资产阶级即工商业中间阶级的要求。”^[3466] 民主只是寡头的意识形态工具,无产阶级未被纳入“民主”的考量。著名的帕麦斯顿勋爵就“知道把民主的词句和寡头政治的观点调和起来”^[2145]。

二、贵族寡头统治的形式、实质和危机

金融资本积累的规律,即跳过“W”的“G-G”的直接钱生钱增殖模式,是支配贵族寡头专制的底层逻辑。金融贵族寄生在国家肌体上,通过自己的政治代理人——辉格党和托利党——进行了轮流坐庄式的

政治统治,他们垄断政权和财税,用公权力谋私。寡头统治不断造成内阁和议会解散的危机,严重阻碍着议会改革和民主政治;不可避免的投机活动不仅不能缓解经济危机反而会加重危机;贵族军官长期压迫着无产阶级出身的士兵,导致前线接连爆发军事危机。

第一,寡头专制的表现形式是轮流执政或联合执政。君主立宪制的政体决定了议会和内阁是影响寡头专制的关键。马克思通过经常性旁听议会辩论得出结论,“辉格党和托利党轮流执政的秘密:每个党都宁愿让自己的政敌保持接替自己执政的能力,而不愿互相破坏政治‘声誉’,使统治阶级的统治彻底垮台。”^{[18]62}在议会选举中得胜并组阁的党派均隶属于资产阶级寡头,他们真正提防的不是政敌而是无产阶级,他们希望“尽可能地避免真正的斗争。一旦斗争真正开始,‘千百万人’,即他们所谓的‘下层’阶级就会跟着挤上舞台,他们不仅作为旁观者或公断人,而且会作为斗争的一方出现在舞台上。”^{[2]375-376}贵族寡头或两党轮流坐庄,或组建由多党派人士构成的“联合内阁”,以此“保卫他们的共同特权而联合成一个紧密的整体”^{[3]590}。寡头统治的这种形式一方面体现了阶级内部矛盾,另一方面更反映出壮大的无产阶级已经威胁到寡头统治。

第二,贵族寡头统治的实质是金融贵族寡头专制。金融贵族寡头,作为英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支配着国家的产业和信用体系。马克思指出,当今的时代是“进行证券交易的金融寡头时代”^{[11]10},且“高利贷精神早已统治了不列颠议会”^{[3]652},“立宪君主制度与享有垄断权的金融界结成了联盟”^{[11]62}。金融寡头利用中央银行和国

债稳固了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支配地位,作为金融贵族寡头代表的辉格党“像保持自己的世袭财产那样保持着对政权的垄断”^{[3]418-419}。对土地贵族而言,“1846年废除谷物法,只是承认了一件既成的事实,承认了不列颠市民社会的成分中早已发生的变化,这就是:土地贵族服从于金融贵族,地产服从于商业,农业服从于工业,乡村服从于城市。”^{[3]416-417}工业巨头则“把行政管理的垄断权和国家官职的独占权让给了辉格党这一贵族寡头”^{[3]418}。

第三,寡头专制导致政治危机。“假民主、真专制”是英国政治的特质,寡头专制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主要表现在形式民主、议会危机、传统政治秩序解体三个维度上。当时所谓的民主选举的真实基础是“互相竞争的政党的候选人代表着选民群众的利益,而这些有特权的选民又代表着没有选举权的群众的利益”^{[3]436}。因此,“寡头代表选举人—有财产的选民—没有选举权的无产者”就构成了一幅“形式民主”的政治画卷。自1831年议会改革后,“占国内人口大多数的没有选举权的居民对享有特权的选民圈施加的压力越大,中间阶级要求扩大选民圈的呼声和工人阶级要求彻底消灭享有特权的选民圈的呼声就越高”^{[3]437}。大众对选举失去热情,议会不断经历解散—重组的循环,“旧议会解散了……它已经分裂成一个个互相使对方不能有丝毫作为的派别集团了。新议会开始时的情形则同旧议会完结时一样。它一生下来就陷于瘫痪状态。”^{[9]438}“内阁一个接一个地组成,不过是为了在上台执政几个星期之后又自行解散。危机是永久性的,政府不过是临时性的。一切政治活动都中止了”^{[2]188},传统政治秩序正在解体,国家“陷入兜圈子的境地”^{[3]588}。

第四,寡头专制导致社会危机。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在寻求政治权力,无产阶级反对的是“辉格党中的两种人:贵族和资产者,即压迫他们的地主和剥削他们的金融巨头”^{[3]420},而工业资产阶级在获得经济权利的同时却不被允许“参加政府”^{[3]573}。金融贵族与工业巨头时而联合时而对抗,无产阶级则在被利用和被剥夺中不断挣扎。在19世纪40和50年代,英国社会中饥饿致死和强制移民不断发生,粮食短缺、粮价上涨以及罢工普遍出现。社会危机的根源是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而寡头专制则是进行剥夺性积累的必然政治形态,“这种制度在大不列颠本国造成过度生产,在所有其他国家则造成过度投机”^{[12]46}。面对社会危机,贵族寡头试图通过实行自由贸易来应对,结果造成“不是在一个固定的方面进行投机活动,而是普遍地进行投机活动,……推行到一切经济部门”^{[17]54}。就寡头专制而言,马克思认为“只要这个制度还存在,危机就必然会由它产生出来”^{[17]607}。

第五,寡头专制导致军事危机。贵族垄断着军官职位,又与军火商联系密切,他们在实际上支配着军队。马克思援引帕麦斯顿勋爵的话,“‘军队的组成本身就是对宪制的一种充分的保障’,因为军队中的军官大部分是‘有财产和有地位的人’”^{[11]402}。这种观点从侧面反映出军队支撑着寡头专制。在英军中,“士兵基本来自农业劳动力,只是在战争进行一段时间之后才从城市的不安分的人中间得到了大量的补充兵员”^{[12]292-293}。这种“把兵士和军官分隔开来并把军队分成两个像是不同种族的那种重大差别”^{[16]574}的制度造成英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屡屡失利,残酷的鞭挞体罚、混乱的后勤管理、糟糕的医疗卫生状况和不切实际的指挥使英

军出现大批逃兵、伤员和阵亡者。此外,寡头专制还在战略和指挥层面造成重大危机,“战争的指挥权完全操在外交家手中”^{[18]350},内阁和议会中的争斗导致军事战略始终不能协调与很好执行,甚至在前线战事紧张的情况下,内阁还在设法将决策失误归责于前线指挥官,议员则忙着争夺新成立的陆军部的官职。可以说,寡头垄断下的军事机关充满政治斗争、算计和欺骗,军事决策罔顾战争规律和部队实际情况,军事危机愈演愈烈。

三、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镇压及其对革命领导权的丧失

资本大量流入工业,使得产业资本迅速扩张,作为其人格化的工业资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中坚。工业资产阶级主张自由贸易,与较保守的贵族进行了长期斗争。但是,由于自身的阶级狭隘性,工业资产阶级并未将推翻寡头专制作为目标,而是选择经济上斗争、政治上合流,共同镇压无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的壮大不但没有推翻反而间接加强了寡头专制,这表明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第一,工业资产阶级成为阶级中坚。当时英国普遍建立了机器大工厂制度,“联合王国最近六年以来社会史上最令人瞩目的事情,毫无疑问,就是这种制度的迅速扩大”^{[11]117},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诞生,并以曼彻斯特派的政治形式活跃于政坛。曼彻斯特派“是现代英国社会的官方代表者,即统治着世界市场的英国的代表者……是竭力想把自己的社会势力也变成政治势力并把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批傲慢的残余加以铲除的工业资本的党派。领导这个党派的是英国资产阶级中最积极最坚强的部分——工厂主”^{[13]422}。产业资本是当时资本积累和增殖的

主体，工业资产阶级也成长为本阶级的中坚力量，“尽管它目前在议院中的力量微弱，仍然是左右局势的真正主人”^[780]。他们“要求让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的、不加任何掩饰的统治，要求全社会公开地、正式地服从现代资产者生产的规律，服从那些管理这种生产的人的统治”^[3422]。工业资产阶级要求建立一个“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处在自由竞争的无限的统治之下，总共只留下一个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行政管理”^[3423]的“资产阶级共和国”^[3423]。这实质上是以工业巨头的寡头统治代替贵族的寡头统治。但是，工业资产阶级在实际中往往满足于贵族在经济上的让步，止步于对国家政权的争夺。

第二，工业资产阶级与贵族合流。作为工业资产阶级上层的工业巨头逐渐贵族化并成为贵族寡头的组成部分，他们是金融资本这个总资本支配下的产业资本的人格化，寡头专制是其必然追求。工业巨头“不像法国人那样容易激动。虽然他们也力求实现议会改革，他们却不会为此而进行一次二月革命。相反地，在1846年由于废除谷物法而取得了对土地贵族的巨大胜利以后，他们就满足于从这一胜利中获得的物质利益。”^[3424]他们“把行政管理的垄断权和国家官职的独占权让给了辉格党这一贵族寡头”^[3418]。贵族寡头和工业巨头的合流集中表现为压迫无产阶级，例如托利党首相格莱斯顿降低关税和消费税是“为了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581]；所得税改革也成为“使保守党人、曼彻斯特学派和《泰晤士报》所代表的‘社会舆论’结成共同反对派的一个焦点”^[182]。辉格党首相帕麦斯顿将选举权扩大到工业大城市是“防止‘实现普遍改革’的最可靠的手段”^[1407]，工业巨头极力维护寡头专制，防止无产阶级获得政治权力。

第三，资产阶级欺骗和利用无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意识到他们代表着普遍的在现代社会中占主要地位的利益。因此他们能够要求选民本着全民的利益、而不按个人或地方的动机行事。”^[3436]但这种全民代表性是虚假的，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支持根本无法取得与贵族斗争的彻底胜利，“对资产阶级来说，不得不依靠人民的支持已经不是第一次了”^[595]。“工业资产阶级……在危急的时候利用这些幻想把激愤的工人阶级的激愤情绪从他们的真正对头身上引开，而引向工业巨头的对头，即土地贵族。”^[1511]由于自身的阶级狭隘性，加之受贵族的分化和引诱，工业资产阶级转而选择欺骗和利用无产阶级以满足自身利益，工厂主“不允许他们的工人建立类似的组织来与他们为自己的这种组织分庭抗礼。他们想用合作的垄断来加强资本的垄断。他们将作为一个联合体迫使工人接受自己的条件……他们想成群结队地进攻，而只让对手单枪匹马地反抗。”^[1287-288]因背叛与无产阶级的反贵族同盟，曼彻斯特派在1857年议会选举中惨败，这意味着“工厂主放弃了他们在反谷物法同盟运动中所夺取的革命领导权”^[10101]。工业资产阶级与贵族组成了反对无产阶级的“神圣同盟”，实际上也就丧失了革命领导权。

第四，工业资产阶级联合贵族镇压无产阶级。马克思指出：“英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他们为了避免向无产阶级让步而力图与寡头政治的执政者妥协。”^[7144]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和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成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战争已成为不可缓和的、不可掩饰的、公开承认的和人人清楚的事了”^[1511]。为了巩固资本对劳动的奴役，以达到“作为现代生产的

单纯工具的无产者应该被奴役”^[2453]的目的,工业巨头和贵族寡头走向了联合。19世纪30和40年代,在围绕“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爆发的斗争中,贵族最初为报复工业资产阶级废除谷物法,转向支持工人运动,迫使议会通过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以打击工厂主,但“1850年,地主老爷们的怒气渐渐平息了,他们和厂主老爷们取得了妥协,即一方面宣布轮班制非法,另一方面作为对强制实施该法律的一种惩罚,迫使工人阶级每天加上半小时的额外劳动。”^{[3]655} 贵族寡头和工业巨头都惧怕无产阶级甚于惧怕对方,所以他们总是选择互相妥协、共同镇压无产阶级,这在根本上是维护寡头专制。

第五,中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可以联合的力量。中小资产阶级介于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掌握很少的生产资料,没有政治权力,随时面临破产风险,无法跃升阶级上层,只能以仆役、附庸等形式存在。中小资产阶级因其小私有制根基而反对寡头专制,是无产阶级潜在的同盟。马克思指出,如果克里米亚战争导致寡头无力统治英国,那“只剩下两个阶级能执掌政权:小资产阶级即小有产者阶级和工人阶级。”^{[6]208} “英国人民群众,城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和托利党一样仇恨‘财主’。他们也和资产阶级一样仇恨贵族。”^{[3]420} 在当时327个选区和654名下院议员中,“72个选举巨头控制着297个选区。所谓‘独立的’选区仅仅有30个,……594名议员是由297个受控制的选区选出来的……不是贵族,就是贵族的直系亲属。”^{[2]526} 同时,中小资产阶级经常被寡头用来转嫁损失,例如迪斯累里的财政预算案“由于征收新的所得税、扩大房屋税的缴纳者的范围并把房屋税的税额增加一倍,城市居民的税负加重了……小店主、工资收入较高的机械工人和商业职员

都成了房屋税的纳税人,并且第一次成了征收所得税的对象。”^{[3]578} 这实际上是牺牲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去补偿寡头的经济损失。

四、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原因、条件和目的

贵族寡头和工业巨头为维持寡头专制,将盲目投机、竞争以及战争等导致的损失都通过加强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来补偿,同时镇压后者的反抗。寡头专制的压迫和经济斗争的失利使无产阶级认识到:单纯通过经济斗争不可能获得解放,必须要通过坚决的政治斗争去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只有夺取政权才能真正解放自己。

第一,劳资矛盾的发展是无产阶级转向政治斗争的根本原因。“大不列颠是资本专横和劳动被奴役达到了顶点的国家……这里不再有大陆各国那样的几乎在同等程度上依靠自己的财产和自己的劳动的人数众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阶级。在大不列颠,财产同劳动已经完全分离。因此,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中,组成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战争都没有这样巨大的规模”^{[8]134}。英国已经完全裂解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尖锐的劳资矛盾中也蕴含着无产者获得解放的因素。“现在,大陆的上空还只是电光闪闪,但在英国已经是地动山摇。在英国已经兴起了改造现代社会的真正的风暴。”^{[3]662-663} 解放劳动的前提就在于提升劳动社会化的程度,而英国无产阶级已经“创造了解放劳动的第一个条件”^{[8]134}。接下来无产阶级要做的就是实现解放劳动的第二个条件,即“把这些生产财富的力量从垄断组织的无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使它们受生产者共同监督……工人阶级征服了自然,而现在它应当去征服人了。”^{[8]134} 这就是

要通过政治斗争去掌握国家,只有当经济斗争发展到自觉为夺取国家政权而斗争的时候,这种斗争才是政治斗争。

第二,经济斗争的不彻底性是直接原因。经济斗争是无产阶级为维护自身经济利益、改善生活和生产条件而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其斗争的最初形式,主要手段是罢工,具有不彻底性,其“无力消除那些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基础的必然的和自然的结果的现象”^[1344]。经济增长与无产阶级境遇的改善没有直接联系,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必然导致“利润的减少从工人工资的削减和国内贫困现象的迅速增长得到了补偿”^[1739]。同时,资产阶级也在“有步骤地组织本阶级进行反对工人阶级的战争”^[1546],联合停产或降薪,使工人陷入极端贫困,拉拢中小资产阶级反对工人运动。无产阶级希望依靠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的方式也是异想天开,寡头专制使法律沦为“统治阶级对工人虚假的让步”^[1121]。法律在立法层面就已不公正,“在资产阶级大发横财时期的英国,法学家对于有关财产的每一条法律和每一份文件就作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解释;在贵族阶级发财致富的苏格兰,则作有利于贵族阶级的解释,而在两种场合下,都充满着敌视人民的精神。”^[11575]在司法和执法层面也充满了对无产阶级的压迫。无产阶级“甚至连维持自己肉体存在的保证都没有”^[6153]的境况,不可能通过经济斗争消除。

第三,无产阶级对寡头专制的清醒认识。经济斗争推动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化,使其认清了寡头专制的阶级对立本性,寡头“需要金钱来实现对国内和国外的压迫。它向资本家和高利贷者借钱……国家用课税的办法向劳动阶级榨取金钱来支付这些款项,这样,人民便给自己的压迫者做了保

人,使贷款给这些压迫者的人放心地借钱给他们,让他们扼杀人民。”^[1163]寡头凭借对政权的垄断,全方位地压制和剥夺无产阶级,把工人“当作自己的忠顺奴仆来看待”^[11287]。寡头专制无法为国家发挥任何建设性的作用,最终损害的都是无产阶级的利益。“现代统治阶级的特权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奴役,都同样是以现行的劳动组织为基础的,现代统治阶级当然要用它所拥有的全部工具(其中之一就是现代国家机器)来维护和支持现行的劳动组织。”^[19126]无产者已经认清了这个统治自己的寡头专制政权的腐朽、反动本性,意识到寡头是用整个国家的力量在对付自己,于是便开始寻求用联合的政治斗争去与这些“绅士”作抗争,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阶级组织来回敬他们的厂主们的阶级组织”^[11547]。

第四,宪章派具有较成熟的斗争原则和经验。宪章派被马克思视作“不列颠工人阶级的具有政治积极性的部分”^[3424]。宪章派没有选择暴力革命而是选择了议会斗争,这是因为寡头专制下英国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军队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的对立面,“人民的力量还太弱,不能对这些‘社会条件’进行革命,他们只好诉诸议会,要求至少把这种条件缓和和调整一下。”^[11740]宪章派的斗争原则是“对普选权的要求,以及使普选权不致成为工人阶级的空想的那些条件,这就是:实行秘密投票、规定议员支薪、每年举行大选。”^[3424]而在英国这样一个具有较完善的形式民主的国家实行广泛的、真正的普选权就意味着无产阶级掌权。“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和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3424-425]宪章派在1854年联

合工联等召开的“工人议会”是政治斗争的一个里程碑，工人议会是无产阶级自发成立的、各行业工人真正的代表机关，“标志着工人阶级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19]125}，反映出无产阶级已将自主掌握政权定为斗争方向。

第五，政治斗争的目标是掌握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寡头的所谓改革是“要保存旧的制度，办法是使它具有一个更明智的形式，也可以说是让它学会采取新的面貌。这就是英国的寡头立法的‘传统智慧’的秘密。”^{[11]56} 这表明寡头不会自行退出政权。“的确，要解放被压迫阶级而不损害靠压迫它过活的阶级，而不同时摧毁建立在这种阴暗社会基础上的国家全部上层建筑，是不可能的。”^{[17]628} 因此，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必然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标。英国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已经逐渐认识到，只有通过民主革命才能建立自己的政权、打碎寡头强加的枷锁。为了适应产业资本的发展，金融贵族开始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自由贸易就必须改变财政体制，即从间接税转变为直接税，但直接税会直接显现出各阶级需要为国家开支承担的数额，而“一旦征收直接所得税的机构建立起来并且安排就绪，把政权掌握到自己手中的人民就将充分使它动作起来，以便建立工人阶级的预算。”^{[15]95} 无产阶级就是要通过政治斗争去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使资产阶级处在无产阶级的新型民主国家的统治之下。

五、结语

在 19 世纪 50 时代，英国的资产阶级寡头统治集团内部分为金融贵族、土地贵族、工业巨头等代表不同职能资本利益的党派，这些党派互相倾轧又互相联合，但寡头专制未曾被撼动。无产阶级为改善自身生产和生活条件的经济斗争都在寡头镇压下

失败了，但这些经济斗争失败与寡头专制的加强却促使无产阶级认识到：只有推翻寡头专制、掌握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真正的劳动解放。正是在反对寡头专制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复兴和壮大本阶级的政党和社会团体，从单纯的经济斗争发展为夺取国家政权的政治斗争。马克思在“1852-1858 年间英国政论文章”中所阐释的无产阶级走向政治斗争的逻辑，在后来的苏俄和中国得到了成功实践。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责任编辑：马俊

“新质生产力：合肥巧解‘四对关系’”等八则

新质生产力：合肥巧解 “四对关系”

合肥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非一日之功，而是有效处理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产业周期与干部任期、城市与人才四对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合肥 GDP 连跨 8 个千亿元台阶，打造出“芯屏汽合”“急终生智”等地标性新兴产业，成为近十年来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

今年前三季度，合肥 GDP 达 9697.1 亿元，同比增长 5.4%，高于全国 0.6 个百分点。其中，新兴产业动能强劲，拉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增速居全国 26 个万亿城市首位，形成以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合肥的实践表明，坚持科学技术打头阵，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突围之道。这一过程中，正确处理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产业周期与干部任期、城市与人才这四对关系是关键。

“新力”成主力

金秋时节，合肥新型显示产业有史以来单体投资最大的项目——合肥国显第 8.6 代柔性屏生产线项目正在紧张建设中，这是合肥国资平台与显示龙头企业维信诺共同投资建设的项目。

“这条生产线在技术上领跑行业，总投资额更高达 550 亿元。”合肥国显相关负责人说，当前全球新型显示产业周期呈现明显上行趋势，此次国显 8.6 代线的建设，就是布局新赛道，抢占全球高端市场的重要一步。

国显 8.6 代线项目是合肥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缩影。数据显示，今年 1~8 月，合肥经济增长中的工业主引擎作用凸显，全市 37 个大

类行业中，28 个保持增长，新质生产力表现突出，成稳增长的主力。

新兴产业支撑有力。今年以来，仅平板显示及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制造业两大新兴产业，对合肥市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就达八成。新型显示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作为国内最早布局显示面板制造的城市之一，合肥市已聚集起包括京东方、维信诺、视涯科技等显示产业上下游企业 150 余家，产业规模、营收超千亿元，入选首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安徽合肥新站高新区经济发展局经济运行处负责人刘芳说，该区是合肥市新型显示产业集聚区，今年以来，合肥京东方、维信诺等龙头企业在车载显示、手机和平板电脑等领域出货量持续居全国前列，今年上半年新型显示产业产值同比增长 33%，拉动全区产值增长 20 个百分点，贡献率高达 77%。

“新型显示产业发展亮点突出，以蔚来、大众、比亚迪合肥基地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也快速兴起。”合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综合规划处处长季丰说，今年 1~9 月，合肥汽车产量超 131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 92.75 万辆，同比增长 74%，仅比亚迪合肥基地 9 月单产就已超 10 万辆，平均一分钟下线两辆车。

未来产业蓄力增长。“今天的未来产业就是明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合肥市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处处长刘言说，今年初，合肥市实施制造业提质扩量增效行动，将低空经济、量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一批未来产业作为制造业专项投资重点，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目前，合肥入选人工智能产业国家重点布局城市，量子信息聚集企业 70 多家，低空经济聚集近百家企业，聚变能商业应用稳步推进，合成生物

创新研究院、首个生物制造产业园相继成立。1~9月,合肥市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36.7%,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43倍,未来产业布局有力支撑投资增速。

传统产业数智化转型加速。合肥加快传统家电产业数智化改造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加速融合。1~9月,合肥市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增长44.6%,连续20个月保持40%以上增速。

正确处理四对关系

合肥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非一日之功,而是有效处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产业周期与干部任期、城市与人才等关系,激活了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实现了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要素驱动的转变。

处理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关系,以耐心资本浇灌创新产业。今年合肥工业增长主要得益于前几年布局的长鑫存储、蔚来、大众、比亚迪等项目进入收获期。蔚来汽车董事长李斌说,蔚来从幼苗成长为今天能抵挡一些风雨的小树,靠的是安徽省和合肥市对智能电动汽车产业的支持及其耐心资本的持续浇灌和培育。

据了解,合肥组建了总资产超8400亿元的国有投资平台公司,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建立“国资引领—项目落地—股权退出—循环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模式。截至目前,合肥累计投向京东方、长鑫存储、蔚来、晶合集成、欧菲光等企业超1700亿元,参投项目超600个,撬动项目投资超6200亿元,实现投资综合收益约600亿元,助力战新产业占规上工业比重持续上升至约55%。

“国有资本作为耐心资本,发挥了领投和示范的作用,其参与产业投资大大增加了社会资本的信心,而国有资本完成既定目标后,及时通过市场化方式退出并获得相应收益,从而为新的产业投资积累了资金。”合肥产投董事长江鑫说。

合肥还打造总规模超过3000亿元的“基金丛林”,持续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和机制。其中,针对初创型科技企业融资难,设立风险容忍度高达40%和50%的天使基金、种子基金,重点支持成立三年内的初创型科技企业和高校

院所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目前,合肥市级天使基金累计投资项目447个,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130家;种子基金累计出资项目90个,总金额超1.7亿元,已投项目中有32个后续获得股权、债权融资。金融活水浇灌了创新丛林,2023年全市平均每天净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5户。

处理好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关系,破解科技经济两张皮。合肥市以改革的理念优化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

如建立大科技统筹工作机制,2021年以来成立市委科创委、市战新委、市产业研究院、市科创集团,安排一名市委常委专职负责,实现“科技—产业—金融”一体化统管;再如针对新技术新模式首用难,率先成立城市场景促进机构,在市发改委设立场景创新推进处,为好产品找好场景。目前全市新设汽车产业处、市场拓展指导处、楼宇经济处、场景创新推进处等处室37个。

职能优化方面,以“科技即产业”理念,将市科技局的职能从“统指标、评项目、兑政策”,转变为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开展科技招商。目前已针对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重点高校院所等建立5个科技成果转化专班,并在长春、西安、成都等地设立联络中心,助力上述地区高校就近就便转化成果。自2022年以来,已先后对接全国近230所高校院所,挖掘约6500项科技成果,累计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招商新成立企业超1700家,其中获得社会投融资企业已达110家。

在此基础上,合肥市坚持只要值得就舍得,近三年市财政科技支出666亿元,持续支持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原始创新,仅2023年,财政科技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4%,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近三年,合肥诞生了多项刷新世界纪录的重大原创成果,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

处理好产业周期与干部任期关系,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产业周期和领导任期常常难以匹配,如何避免干部一走,产业就散?合肥的经验,坚持“前人栽树、后人浇水”,一任接着一任干。

合肥市委常委、副市长袁飞介绍,从新型显示、集成电路产业,再到新能源汽车产业,历经多任书记、市长,如果每届班子关心支持少一点,这

些产业都不可能成长为今天的产业集群。以长鑫存储为例,自2016年成立以来,经历多任市委主要负责人接力推进,目前该企业填补了国内动态存储芯片空白。

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把握“新质”,考验的是干部“素质”。零重力飞机工业(合肥)有限公司创始人石红等受访企业负责人表示,合肥的干部对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的包容性强、接受度高,正是看到这么多年合肥对产业的支持和对企业的包容,才坚定选择合肥。在这里,初创落地企业可以扎根,落单企业可以扎堆,落选企业可以在合肥逆袭。

在不少合肥市干部眼中,企业是城市发展的“合伙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一哄而上,也不能单打独斗,关键要有用户思维,持续营造良好的产业生态。合肥市成立产业专班,分类研究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大力营造“宽以待企”的环境,对企业轻微违法行为,区分“大意”和“故意”,制定落实免责清单、轻罚清单;对暂时看不清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实施包容审慎监管,设定行业“观察期”、政策“过渡期”,不搞一刀切。近年来,在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中,合肥已连续两年居全国省会及副省级城市前十位。

处理好城市与人才关系,积蓄第一资源。合肥聚焦国家战略所需、人才发展所需,迭代升级人才政策,全力支持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家实验室等高能级科创平台人才队伍建设,每年分春秋两季开展合肥专班“高校行”、高校师生“合肥行”等招引活动,既招人才又招成果。

同时,改革探索把人才评定权交给用人单位,打破学历、职称限制评定高层次人才,吸引越来越多人才成为“城市发展合伙人”,实现人才、城市双赢共进。2023年,合肥净增人口超20万人;新增就业参保大学生超35万人,创历史新高。

持续改革走好科技创新必由之路

受访者谈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应发挥科学技术打头阵作用,用改革办法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当前,有的地方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意愿和能力不够强,部分产业出现下滑。有的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大,影响了对新质生产力的投入,亟待统筹高效用好各类产业资金,将有限的资金合理分配,

助力新质生产力的星星之火早日燎原。

当前形势下应结合实际给予更多政策包容度,有效落实存量政策,加力推出增量政策,慎重出台限制性政策。既防止恶性竞争,也要用好市场优胜劣汰的作用推动落后产能出清,致力于发展新质生产力企业。特别要牢牢把握国家政策导向、产业发展方向、技术变革走向,始终把握行业发展主动权。

对一些短期看不清形势的行业,应支持和规范并举,对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应有政策担当,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打破瓶颈。同时,慎重出台涉税措施,稳妥把握绿色低碳发展相关指标,确保产业项目正常运行。

此外,优化政策举措,更好释放“以旧换新”“设备更新”等政策红利,为新产品新技术提供更多应用场景。加快企业出海步伐,鼓励企业抱团“走出去”,开拓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来源:《瞭望》2024年第46期)

总书记考察的这个“科学城”, 是个什么城?

据新华社报道,10月17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察看安徽省重大科技创新成果集中展示,听取推进科技体制机制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等情况介绍,同现场科研人员和企业负责人亲切交流。

习近平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高新技术是讨不来、要不来的,必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

合肥滨湖科学城,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那么,滨湖科学城在哪里?为什么要建滨湖科学城?建设进展如何?

历程

说起“滨湖科学城”,就要先从安徽科技领域的一件大事说起。

在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获批之后,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第二个获批。2017年9月,《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实施方案(2017-2020年)》正式印发,这是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的“施工图”。

这张“施工图”提出的具体任务包括,建设国家实验室、建设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建设一批交叉前沿研究平台、建设一批产业创新转化平台、建设“双一流”大学和学科,以及建设滨湖科学城。

根据《方案》,合肥滨湖科学城初步建设范围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在合肥高新区布局建设国家实验室核心区和成果转化区,二是围绕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科学岛”建设大科学装置集中区,三是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建设教育科研区。涵盖了肥东、肥西2个县和包河、蜀山、庐阳3个区的部分区域,覆盖4个国家级开发区(合肥高新区、合肥经开区、合肥出口加工区、蜀山经开区)和3个省级开发区(肥东经开区、肥西经开区、包河经开区)。

可以看出,合肥滨湖科学城成为合肥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建设的重要载体和集中展示窗口。

2018年10月9日,合肥滨湖科学城管委会揭牌,为省政府派出机构,委托合肥市管理,与中共合肥滨湖科学城工作委员会合署办公、一套机构,这也成为合肥滨湖科学城正式成立的标志。

目前,根据合肥市委市政府部署安排,滨湖科学城主要负责合肥未来大科学城、骆岗公园、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的“投(投资)、建(建设)、运(运营)、转(转化)”,承担安徽科技大市场建设、国家实验室服务保障等工作。

进展

挂牌六年,滨湖科学城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果。

2020年8月19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合肥参观了安徽创新馆,强调“要进一步夯实创新的基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培育新兴产业,锲而不舍、久久为功”。

合肥滨湖科学城管委会副主任、安徽创新馆服务管理中心主任陈林告诉记者,安徽创新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安徽省委、省政府,合肥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坚持“市场逻辑、平台思维、专业力量、国际标准”,大力开展体制机制创新,全力建设安徽科技大市场,创新独具

特色的科技成果展示转化交易一体化运营模式。

目前,安徽创新馆累计开展成果转化对接活动547场,挖掘国内外成果1.8万项,挂牌、转化科技成果3027项(含成立公司160家),促成科技成果转化交易金额超1160亿元,完成技术合同登记额486.72亿,分别较2020年同期增长973%、3474%、2402%、1384%、933%。

规划总面积12.7平方公里合肥骆岗公园,在去年9月26日第十四届中国(合肥)国际园林博览会盛大开幕之际,正式开门迎客,开幕式当天入园人数达6.3万人次,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共接待游客约225万人次。

位于合肥滨湖科学城北部的合肥未来大科学城,依托现有的合肥科学岛和在建的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选址在庐阳区三十岗乡中部和长丰县岗集镇南部区域,规划范围80平方公里。

其中,首期建设19.2平方公里,全面实施大科装集群、深空科学城、科学家小镇、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总部园区、中科大国际校区(天都校区)5大标志性项目,努力打造岗丘相拱、科教融合、文旅辉映的科学高地、诗意田园。

去年4月24日“中国航天日”合肥深空科学城概念性设计规划也首次对外发布。这里将打造世界一流的深空探测综合性研究基地,围绕深空技术、深空科学、深空资源、深空安全四大领域12个研究方向,支撑和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工程。

可以看到,经过近年来大力建设,合肥滨湖科学城正向着科研要素更集聚、技术创新更活跃、生活服务更完善、生态环境更优美的“世界一流科学城”目标奋进。

使命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在科技、人才、创新上,近年来,合肥市乃至安徽省一直致力于在科技体制机制创新上走在前列。

2021年,合肥市组建市委科技创新委员会,统筹全市科技创新工作,各县(市)区也相继成立科创委,形成了全市上下“一盘棋”的工作格局。

合肥市还颁布实施了《合肥市科技创新条例》,从法治层面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推进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为科研人员和企业提供了更加

便捷高效的创新服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合肥滨湖科学城是承担这些方面改革任务的重要“试验田”。

合肥滨湖科学城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吴爱国曾表示，将着力构建“投、建、运、转”一体化发展良性格局，持续推进一体化融资，一体化构建未来大科学城建设管理服务体系，推进“管委会+公司”紧凑型、一体化建设，一体化提升科技成果转化保障政策水平。

纵观全国来看，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国家科技领域竞争的重要平台，我国先后批复了五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为支撑这些中心的战略目标，这些地区也在部署建设科学城。

从上海张江到北京怀柔，再到粤港澳大湾区，这些先发地区的科学城建设，也都能为合肥滨湖科学城建设提供借鉴。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

肩负新使命，站上新起点的合肥滨湖科学城，更加令人期待。

(作者：丰静；来源：“江淮观察”微信公众号，2024年10月)

安徽合肥滨湖科学城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放开手脚，让科技打头阵

金秋时节，天朗气清。安徽合肥滨湖科学城，一项项科技成果正落地生根。

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察看安徽省重大科技创新成果集中展示，听取当地推进科技体制机制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等情况介绍，同现场科研人员和企业负责人亲切交流。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高新技术是讨不来、要不来的，必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合肥滨湖科学城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陈林深感重任在肩：“我们将竭力为科研工作者放开手脚创新创造提供服务保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18日，记者见到陈林时，他正在通电话，忙着帮“熟人”解决问题，“丁老师，还有啥需要帮忙的，你尽管说。”

电话那头，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教授、安徽中科热仪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延伟。中科热仪是一家刚刚成立几个月的高技术公司。

“了解科创企业运转情况，时时关注企业需求，帮忙排忧解难，我们的工作做得越细致越好。”陈林说。

去年下半年，丁延伟凭借自主研发的热分析与量热仪产业化项目通过中科大科研成果赋权，成果开始进行落地转化。

然而，在实验室里得心应手的科学家，在筹备企业时却犯了难，“感觉两眼一抹黑”，丁延伟说。就在此时，盛子杰联系到他。

盛子杰是滨湖科学城下属安徽科技大市场建设运营有限责任公司高级项目经理，正在中科大科技成果转化办公室挂职，“我们长期跟踪中科大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主动联系对接，帮助科研人员解决科技成果转化过程当中的各种难题。”

详细了解丁延伟团队的需求后，服务举措接二连三到来。

缺少启动资金？滨湖科学城推荐了合肥市种子基金和天使基金上门洽谈。

没有办公地点？滨湖科学城联系了各区县科技局工作人员前来调研。

需要产业支持？滨湖科学城主动对接产业链相关产业园，争取优惠政策。

今年6月，安徽中科热仪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落户合肥庐阳大数据产业园。“真没想到，项目落地速度这么快。如果没有滨湖科学城的支持，单靠我们自己摸索，不知道要走多少弯路。”丁延伟感慨道。

陈林介绍，滨湖科学城主要负责合肥未来大科学城、合肥骆岗公园、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的投资、建设、运营，承担安徽科技大市场建设、国家实验室服务保障等工作。

科技成果加速转化。自运营以来,滨湖科学城大力推进安徽科技大市场建设,累计挖掘国内外成果 1.8 万项,挂牌、转化科技成果 3027 项,含成立公司 160 家,促成科技成果转化交易金额超 1173 亿元,完成技术合同登记额 486.72 亿元。

9 月,安徽科技大市场芜湖市鸠江市场揭牌运营。“安徽科技大市场已在省内建设科技分市场 15 家,将科技成果转化资源串珠成链、串链成网,在我们服务企业过程中可以统一实现资源赋能。”盛子杰说。

陈林表示,合肥滨湖科学城将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牵引,推动“小管委+大公司”的运营机制改革。同时,建强用好安徽科技大市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大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将合肥骆岗公园建成科技感十足的城市科技成果应用场景试验场。

放开手脚,让科技打头阵。巢湖岸边,一个科研要素更集聚、技术创新更活跃的一流科学城加速崛起。

(作者:徐靖;来源:《人民日报》2024 年 10 月)

创新成果要落地 这个团队能帮忙

安徽省合肥高新区,国科昂辉科技有限公司里,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公司副总经理武恪介绍,从去年开始,订单量持续攀升,公司正抓紧时间组织研发和测试。

“我们是一家主要生产车载基础软件为主要业务的企业。”武恪说,公司创立之初,为让自主研发的软件应用到车企,着实费了一番功夫,“可是软件经常出现故障,远远达不到要求。”

创新成果迟迟无法落地,公司发展陷入瓶颈。

转机发生在 2022 年。这一年,依托安徽工业技术创新研究院建设的智能网联车操控平台开发与利用中试产业基地成立。中试是把处在试制阶段的新产品转化到生产过程的过渡性试验,是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关键环节。

“研究院由安徽省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协议共建,我们整合了院内一个 22 人的技术团队。团队拥有多专业背景,在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

行业拥有丰富经验,可以帮助企业加快实现创新成果落地。”中试基地技术负责人徐封杰说。

在中试基地协助下,昂辉科技的软件故障频出的原因被迅速找到。原来,车载基础软件领域有一套通用国际标准,对软件设计思路、验证指标有着详细规定。但这套标准有很多页,而且全是英文。“最初我们解读标准时,由于缺乏足够的技术理论基础和工程实践经验,很多地方理解不准确,设计思路就不对,软件自然无法顺畅运行。”武恪说。

中试基地承担起解读标准的重任。“我们对标准内容进行了解读归纳,建立起车载基础软件知识库。”徐封杰说。如今,昂辉科技的研发人员在设计软件之前,只需打开对应模块的知识库,就能了解各项技术指标、设置参数。“我们还在知识库中梳理出各项故障出现的原因。一旦发现故障,企业研发人员便可很快定位,做出修改。”徐封杰表示。

知识库的建立还帮助昂辉科技完善了人才培养体系。“汽车电子行业从业人员的技术门槛很高,不仅需要软件开发能力,还要有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的知识背景。”武恪说,知识库不仅为研发人员提供学习素材,公司还可通过不同模块,了解各研发岗位需求,对员工进行培养。

依托定制化的培养体系,这家企业新入职员工仅需 1 个月就能独立上手工作,3 个月就能进入熟练工作状态。

软件研发步入正轨,向车企推广应用成为又一难题。“过去国外软件在市场上占大头,况且我们还是一家小企业,所以刚开始推广时,很多车企都持观望态度。”武恪说。

中试基地得知情况后,派出人员与昂辉科技一起进行市场推广。“中试基地和相关车企有联系,我们可以通过资源整合、信息共享等方式,更好地促进企业间的合作。”徐封杰说。

在中试基地帮助下,昂辉科技车载基础软件工具链产品已为国内数家整车企业配套。武恪说,车载基础软件实现国产化替代,成本可以节省 2/3 左右。

如今,昂辉科技的员工规模有 70 余人,原本只容纳了十几人的几间办公室显得有些拥挤。对于未来,武恪充满信心:“国产车载基础软件还有

很大发展空间,有中试基地帮助,我们会越办越好。”

(作者:罗阳奇;来源:《人民日报》2024年10月)

抓住机遇 加快制造业项目建设

钻孔机轰隆作响,挖掘机铁臂挥舞,运输车往来穿梭……

安徽合肥新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祥和路近魏武路口的一片开阔工地上,合肥国显第8.6代柔性有源矩阵有机发光显示器件生产线项目建设正酣。这是近两年合肥市新开工单体投资最大的项目,总投资额550亿元,由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合肥市政府共同投资。

“9月份签约,接着就开工。”国庆假期后,合肥国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海涛每天都“钉”在工地,“大家都在撸起袖子加油干,年底要完成近80万平方米的主厂房桩基施工。”

锚定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安徽以超常规举措抓发展、上项目。10月8日,国庆节后的首个工作日,安徽即举行今年第四批重点项目开工动员会。551个项目总投资额4268.1亿元,其中投资额在50亿元以上的有15个。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陈军表示,制造业特别是新兴产业,仍是安徽投资的重点亮点。“551个项目中,制造业项目有315个,其中新兴产业项目占48.6%、高技术项目占33.2%。这是安徽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目的结果。”

走进安徽省经济信息中心,占据一整面墙的监控大屏格外引人注目。重点项目的完成投资进度、开工情况等信息,在这里实时显示。

“如果有哪个项目推进不及时,平台就会亮灯预警。”安徽省发展改革委重点建设项目办公室副主任武立祥每天都会梳理重点项目进展情况,“前不久,平台预警了一个民生建设项目超期未开工,我们第一时间与负责该项目的要素保障专班联系,督促解决问题,如今该项目已经顺利开工。”

抓住机遇,安徽推出有效投资专项行动方案,建立项目申报集中联审服务机制,积极争取

各类中央政策资金,推动项目加快建设和资金拨付使用,加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今年,安徽已争取增发国债资金392.3亿元,444个项目获得支持并已全部开工。

线上线下联动,各方合力攻坚。截至9月底,今年安徽前三批开工动员的1382个项目中,开工率达97.3%,投资完成率60.8%,同比分别提高4.8和25.3个百分点。

眼下,安徽正加快推进2025年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工作。“国家一揽子增量政策的出台,对扩大有效益投资是重要的机遇窗口。我们要精准对接,做深做实前期工作,推进项目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充分发挥对有效益投资的关键作用。”陈军说。

(作者:吴焰、李俊杰;来源:《人民日报》2024年10月)

安徽何以成为创业热土

还记得2022年夏天,以超出一本线44分被安徽工程大学录取的“扭扭车”男孩张亮吗?

2024年,对他来说,同样是不凡的一年。今年4月份,张亮在安徽芜湖登记注册了一家科技创业公司,组建了自己的仿生外骨骼研发团队。

“除自己担任CEO之外,团队成员涉及计算机信息、软件开发、机电一体化以及金融工程等多个与创业方向紧密结合的专业。”张亮说,创业初衷很明确,就是想帮助更多残疾人站起来。

7月下旬,“源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季之创业在安徽——走进芜湖,张亮带着自己的项目参加路演。“创新是要打破常规,创业是要突破自我。”回想起这两年的创业过程,张亮颇为感慨,他认为,“敢闯会创,才能勇立潮头。”

作为最具创造力的群体之一,大学生在创新创业大潮中尽情施展,释放着蓬勃力量。引导青年人在“敢闯”的同时“会创”,创新创业环境至关重要。

一直以来,安徽省创新涌动、朝气蓬勃,素有“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近年来,通过大力扶持高校毕业生、科研人员等各类创业者,开展丰富多彩的创业活动,安徽持续完善产业、人才、平台、金融、服务等要素支撑,为在皖创业兴业者提供全方

位保障。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炜表示,“今日之安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创新创业,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求期待人才。”

创,有广阔天地;赛,有无限机遇。在安徽这片创新创业的热土上,无数创业者见证了安徽创业大赛一届一届的茁壮成长。

4月下旬,第三届创业安徽大赛再次开启。有别于往届,本届大赛设置京津冀赛区、长三角赛区、粤港澳赛区等3个省外赛区和1个海外赛区,赴上海、深圳、北京、青岛、香港、英国伦敦、德国慕尼黑、美国波士顿、比利时布鲁塞尔、新加坡等开展10场创业安徽大赛推介,为的就是招引更多优秀创新创业团队和项目来皖落地。

其中省外(含海外)赛区聚焦安徽省十大新兴产业,重点高科技领域、产业链短板领域、“四新”经济领域以及大众创业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创业安徽大赛自2022年举办以来,共吸引了省内外参赛项目1.3万个,其中省外及海外项目近3000个,参赛项目数量和质量创省级同类赛事新高,一大批优秀创业项目和团队通过大赛在安徽落地生根。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政府负责‘阳光雨露’、企业负责‘茁壮成长’”的促创业方式,为创新创业增加了“活力值”。

在创业项目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多种政策加持下,安徽省每年都能吸引众多大学生来皖创新创业。

以芜湖为例,近年来,重磅出台的“紫云英人才计划”,整合医疗、教育、人社等部门23项服务资源,构建“引、育、用、留”全生命周期人才生态系统,实现人才政策“一站查”、人才补贴“一站领”、涉才服务“一站办”,目的就是吸引更多青年人才关注芜湖、选择芜湖、扎根芜湖。

统计显示,“紫云英人才计划”出台三年来,芜湖累计新增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295个、领军人才912人、高端人才7670人、大学生24万人,以厚重的“人才账本”,夯实了城市的创新“家底”。

创业安徽,氛围浓厚,劲头正足。宣城市人社局联合财政、科技、经信等多部门,从产业、人才、平台、资金、服务等五个方面,为青年创新创业提供全方位支持和保障;合肥创业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协同各部门推出41项创业活动,致力打造创业合肥品牌;阜阳结合特色产业,建设认定“接您回家”创业园、农民工返乡创业园29个,扶持引导各类返乡人才创业就业……

近年来,为了加大对创业者的扶持力度,安徽省不断出台补贴政策、扶持政策、招才引智政策,积极整合各方资源,抓人才、抓项目、抓阵地,逐步形成一条有序而接地气的服务链,在创业过程中不断提升创业高度和厚度,推动创业跑出“加速度”。

打响“创业安徽”品牌、出台“皖创22条”、开办“创业安徽建设专题研修班”、开展“创业一件事一次办”……一系列创新举措纷纷来袭,创新活力和创业热情持续释放。自2022年6月启动以来,创业安徽建设全面起势,紧贴创业者的需求,提供全方位创业保障,让更多创业者成为城市发展的“合伙人”。

数据统计,两年来安徽全省新增经营主体274.8万户、总数突破800万户,越来越多创业者看好安徽、汇聚安徽。

创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的重要途径。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完善创业扶持政策等方式,大力推动创业带就业工作,推动创业安徽持续走深。”王炜如是说。

(作者:汪瑞华;来源:人民网-安徽频道,2024年10月)

发挥长三角科技和产业创新 开路先锋作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为更好发挥长三角区域“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重要作用指明了方向。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

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率先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对于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意义重大。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创新要素加快顺畅流动,汇聚众多创新资源,形成协同创新、融合发展的强大势能,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携手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加速推动科技供给转化为创新动能,“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正从蓝图走向现实。着眼未来,长三角不仅要提供优质产品,而且要做好高质量科技供给,通过协同创新,不断推动重大原创性科技成果产出,把科技创新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为高质量发展当好经济压舱石、发展动力源、改革试验田。

一是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发展,打造国家创新高地。

长三角拥有雄厚的科技创新资源,科技产业起步早、发展快,创新人才资源丰富。随着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持续推进,长三角发展新旧动能转换效果明显,一大批新产业新业态茁壮成长,城市群集聚效应逐步形成并向周边辐射,已经成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平台。

进一步提升长三角的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和发展能级,要聚焦国内国际创新资源,促进科技创新要素充分流动,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推进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实现更多“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从1到100”的全产业链创新,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同时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优化资金链、完善人才链,促进“四链”深度融合。构建以价值链为基点的产业链治理关系,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更大力度吸引汇聚全球高层次人才,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

二是推进跨区域合作与体制机制创新,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

近年来,长三角在探索科技政策联动、跨区域交流合作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在推动新技术、

新产品、新模式率先运用以及不断丰富场景方面都有积极进展,区域创新策源能力不断提升,科技创新共同体活力奔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三角区域“要跨区域、跨部门整合科技创新力量和优势资源,实现强强联合”。更好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联动长江经济带、辐射全国,应是长三角的重要任务。把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优化跨区域合作机制摆在突出位置,既可以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畅通渠道,也可以为其他地区科技创新融合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一方面,着力打造科技创新共同体。合作共建国家实验室和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并在长三角合理布局,统筹各类科创平台建设,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共同搭建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在创新链产业链跨区域融合的环节和领域,形成群体优势、联动优势,加快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另一方面,深化创新链产业链跨区域合作。推动集聚在中心城市的创新链向周边地区、中小城市扩散,让各地企业能够以低成本共享中心城市的创新资源,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和现代化水平。充分发挥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作用,打破科研财政资金支持科技创新的地域局限,不断丰富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让创新资源在长三角畅通流动。

三是强化开放思维参与国际科技合作,营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生态。

长三角放眼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在引进高质量外资、推动制度型开放、拓展更广阔市场等方面锐意进取,加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面向未来,需进一步发挥长三角推进制度型开放的先行先试优势,协同推进高水平开放创新,主动融入全球创新链,共建国际合作交流平台,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参与国际科技合作,营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生态。

积极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有利于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有利于促进创新主体协同互动、汇聚国内国际科技创新资源、打通科技创新全链条。长三角要在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方面走在前列,集中优势资源,在生物医

药、能源、先进材料、信息技术、空间天文与海洋等领域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展联合研究,突破重大科学难题。建立国际大科学计划组织运行、实施管理、知识产权管理等新模式、新机制,吸引国际组织、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业及社会团体等参与支持大科学计划。同时构建开放融合的创新生态环境。推动科技规划对接,建立长三角科技会商机制,形成有效分工与协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促进创新主体高效协同,推进创新资源数据共享、创新资源有效配置和建立高效的创新创业服务支撑体系。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产业制高点,充分发挥创新资源集聚优势,协同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进一步推动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

(作者:成长春;来源:《经济日报》2024年11月)

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

今年11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迎来揭牌建设五周年的重要节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率先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对于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意义重大”。新时代新征程上,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第一,以一体化发展方式破解中国式现代化瓶颈短板。

长三角具有人口规模大、区域禀赋条件多样性等特征。特别是仍然存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和相对落后的乡村,需要在深入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中实现欠发达地区更快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同时,长三角地区作为长江经济带的下游地区,在优化长江经济带发展中肩负联动、驱动中上游地区以及引领整个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

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区域重

大发展战略中,长三角地区承担的突出使命是要率先实践、率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区域,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引领示范和坚实基础。现代化建设,有些可以在各个行政区内推进,有些必须跨行政区一体化推进,如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

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方面,关键是市场体系一体化,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让要素自由流动。区域市场体系一体化建设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任务,包括市场准入、政府监管、资质认定、市场平台、信用体系、财税政策等。其改革路线就是要破除行政壁垒,在各个重点领域推进行政区之间的标准统一、规则一致、平台衔接、资质互认、数据共享、一网通办等,加快区域市场体系一体化进程,进而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一个基础工作是实施生态环境流域性、系统性治理。要加强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生态保护红线无缝衔接,加强跨区域联防联控,推进生态功能分区建设、生态廊道保护、环境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机制完善等。关键在于解决好区域利益协调问题,为环境保护作出贡献的地区应该得到更多的补偿和生态价值实现,获得环境保护红利的地区应该承担相应的治理成本,真正形成生态保护区域共同体。

第二,以一体化发展机制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路径。

新时代新征程上,要更加强调整体推进、共同行动,更加强调共建共享、紧密合作,更加强调载体一体、平台统一,更加强调制度创新、系统集成,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一是强化整体推进的统筹机制。增强一体化意识,坚持一盘棋思想,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统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统筹龙头带动和各扬所长,统筹硬件联通和机制协同,统筹生态环保和经济发展,更好发挥规划指引作用,加强规划、土地、项目建设的跨区域协同和有机衔接,加快从区域项目协同走向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

二是完善跨区域项目的共建共享机制。以共建为抓手、共享为目标,在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苏州、宁波等中心城市的牵引下,实施更多跨行政

区公共合作项目。这些跨行政区公共合作项目,不仅包括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共保联治、科技创新联合攻关等“硬项目”,还包括公共服务便利共享、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共建高水平开放平台等“软项目”。其中,既有规划立项、资金筹措、项目执行等建设方面的内容,也有制度衔接、政策协同、标准趋同等改革方面的内容。

三是构建一体化运营载体的成长机制。长三角地区之所以在高铁、机场、电信、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领域有较高的统筹性、协调性,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主体是央企。这些年来,松散型的长三角联盟成立较多,紧密型的一体化运营机构设立较少。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一轮五年中,培育壮大跨区域的一体化建设运营机构是具有显示度的标志性改革创新举措。今年6月,各方就长三角轨道交通公司正式签署合作框架协议,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四是加强区域协同立法的推进机制。可重点围绕创新共同体、生态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建设,设置区域协同立法项目;加强区域协同立法的能力建设和机制建设,汇聚专业人才,搭建工作专班,提高跨区域、跨部门协调能力。在加强立法专班建设的同时,还可研拟设置相匹配的长三角法庭系统。

第三,以一体化发展模式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共同体样本。

一是区域联动、协同发展。促进共享公共资源、功能优势、发展机遇,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比如,建设好“G60科创走廊”和“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加强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带;推动在中小城市的产业链与集聚在大城市的创新链跨区域协同,共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促进生态功能保护区、粮食主产区与城市化地区跨区域协同,构建利益补偿机制;促进乡村产业兴旺与城市需求升级跨区域协同,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需求动能。

二是合理分工、各扬所长。坚持发挥各地比较

优势,推进区域合理分工、优势互补,让各地都有更好的发展机遇、更强的经济韧性。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苏州、宁波、无锡、南通、常州等经济中心城市应推进城市功能空间分工。上海应加快建设“五个中心”,做强长三角城市群的头雁功能和全球性枢纽功能;南京、杭州、合肥、苏州、宁波既有联合又有分工,加快驱动长三角向世界级城市群和世界级创新雁阵前行。与之相伴,发挥好产业链空间分工作用,高端集聚中心城市,中低端向中小城市扩散,以产业链一体化布局和利益协调机制,带动各地同频共振。

三是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最核心的考量指标之一。截至2023年,长三角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12个城市人均GDP在2万美元以上,但还有8个城市人均GDP在1万美元以下。城乡差距也还客观存在,大部分城市的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在2比1以上。低于2比1的有嘉兴、宁波、杭州、舟山、湖州和无锡、常州等城市,其共同特征是县域经济、镇域经济比较发达。下一步,应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机制,深化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作者:王振;来源:《解放日报》2024年11月)

本栏目供稿、责任编辑:黄宁平

启事

本栏目属转载文章,因客观原因未及与作者提前沟通,请作者看到本启事后,与本刊编辑部联系(电话:0551-62206629),编辑部将按本刊相关制度向作者支付稿酬。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24年总目录

理论视野

- 百年大党独有难题与破解之道.....王玉堂(1-3)
- 习近平关于青年理想信念教育重要论述的研究综述.....张舒涵 戚如强(1-9)
-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
.....李平 王玉堂(2-3)
- 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的主要意蕴.....孟书广 张迪(2-8)
-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关于调查研究方法的重要阐释及其现实观照.....魏志达(2-15)
- 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根本遵循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李平 王玉堂(3-3)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核心要义、理论特征及实践价值
.....廖敏宝(3-8)
-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胡俊鹏(4-3)
-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谋划和推进改革
——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李平 王玉堂(4-10)
-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创新思维能力的重要论述.....王玉堂(5-3)
- 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研究态势分析及未来展望.....余守萍(5-11)
- 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及其提升进路.....杨小草 王玉堂(6-3)
-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现实梗阻与优化路径.....李博(6-9)

策论园地

- 合肥深度融入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研究.....王泽强 都鑫(1-16)
-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科技政策绩效评估与比较
——基于合肥、深圳的样本研究.....汪晓梦(1-22)
- 关于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思考
——以江苏省泰州市为例.....于江(1-27)
- 红旗渠精神的内涵、时代价值及弘扬路径.....卢保娣 吕琳(2-23)
- 新时代农村党建引领乡村振兴问题研究
——以江苏省启东市为例.....郭红波(2-27)
- 产业振兴背景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和实现路径
——以安徽省泾县琴溪镇马鞍村为例.....陈华彬(3-14)
- 行政监管视野下涉企行政合规指导路径探析
——以江苏省江阴市为例.....黄春英(3-19)
- 加快推进文旅融合发展研究
——以南通市通州区为例.....张梅(3-23)
- 以新型工业化促进安徽“三地一区”建设.....王智源(4-16)
- 人工智能赋能军民融合创新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完善建议.....周鑫(4-20)
- 城乡融合发展探析.....王玲玲(4-26)

| | |
|---------------------------------|------------------|
| 数字经济助推通州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 | 于盈(4-30) |
| 数智时代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三维审视····· | 于盈(5-20) |
| 与时俱进做好纪检监察宣传工作····· | 陈杨(5-28) |
| 长三角一体化下安徽人口流动与高质量发展研究····· | 周清 王泽强(6-19) |
| 构建社区风险治理共同体:驱动逻辑、现实梗阻与实践进路····· | 刘雅静(6-23) |
| 网络圈层化的技术逻辑与治理路向····· | 王亮亮 贺美然 高慧(6-30) |

学思札记

| | |
|--|---------------|
| 十月革命后列宁关于苏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文化透视····· | 魏志达(1-31) |
|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落实请示报告制度的主要做法与启示····· | 马君怡(1-41) |
| 解读《新的灾难时代》:卡利尼科斯对当代新自由主义的多重批判 ····· | 张文博 吕佳翼(1-47) |
|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系列论述研究 ····· | 马赛 裴国富(2-31) |
| 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国内研究述评····· | 尤文梦(2-36) |
| 2023年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综述····· | 贾磊(2-44) |
|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宣传教育研究述评····· | 魏扬明(2-51) |
| 列宁晚年关于构建监督合力模式的重大创新····· | 魏志达 洪书源(3-28) |
| 《国家与革命》中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生成逻辑、核心意蕴与现实启示 ····· | 种永恒(3-36) |
| 重温《才溪乡调查》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 刘志礼 郭乾(3-44) |
| 邓稼先家国情怀的生成逻辑、表现形式及当代价值····· | 潘润(3-47) |
| 列宁晚年关于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的重要理论与实践····· | 魏志达(4-35) |
| 列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探索及其启示····· | 甘祖昌(4-46) |
| 压抑性还是生产性? ——对马克思主义视阈下国家权能的再审视····· | 王永香 王博(5-34) |
|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弘扬及启示····· | 马赛 吴秋怡(5-45) |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的战略思维····· | 高国连 魏强(5-52) |
| 中央苏区时期革命文化传播载体研究····· | 隋秀英 魏扬明(6-35) |
| 无产阶级从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的内在逻辑 ——基于马克思“1852-1858年间英国政论文章”的分析····· | 白宇乔(6-43) |

信息荟萃

| | |
|-----------------------------------|--------|
| “合肥‘以投带引’推动民营经济追星赶月”等九则····· | (1-53) |
| “安徽合肥:打造国际领先量子科技与产业‘双高地’”等四则····· | (2-58) |
| “垒起‘金窝’,孵出‘金蛋’”等六则····· | (3-52) |
| “中外合伙人共书产业合作新故事”等六则····· | (4-54) |
| “长三角造车记”等五则····· | (5-55) |
| “新质生产力:合肥巧解‘四对关系’”等八则····· | (6-52) |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德不孤必
有邻



中石書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明理路
邮政编码：230031
电 话：(0551) 62206658 62206629
电子邮箱：XB1233@126.com

印 刷：合肥新南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方式：自办发行
定 价：5.00元

